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12
ISBN 7-5366-8388-X

I.邓... II.①中... ②中... III.邓小平(1904~1997)—文集 IV.A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157 号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

DENG XIAOPING XINAN GONGZUO WENJI

中央文献出版社
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017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400016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35.5 字数:413 千字

印数:1-4 500 册

ISBN 7-5366-8388-X 定价:58.00 元(平装本)

出版说明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合作编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邓小平担任第二野战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进军大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这部文集收入邓小平一九四九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关于西南地区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信、题词等文稿一百四十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集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民主改革、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文化建设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他的业绩、思想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价值。

编入的文稿，在每篇文末均注明刊印根据。已收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的都按两书所载刊印。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报

告、讲话记录稿作了必要的文字整理和校订。为便于读者阅读，一部分原没有题目的报告、电报、书信、批示等文稿，拟了题目；有的报告、讲话、电报的节录，也拟了题目；对文稿涉及的重要事件、人物、文献、地名等，作了简要的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月

目 录

进军西南的思想准备工作	(1)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	(4)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关于进军西南军事部署的十五份电报	(11)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工作重心转移的三个步骤	(27)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31)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	(35)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教育干部学习党的各项政策	(38)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二野战军感谢电	(40)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44)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	
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 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48)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	
对进军西藏的意见	(57)

-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 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 克服一切享乐腐蚀思想 …… (60)
-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
- 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担负艰巨的任务 …… (63)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
- 今后斗争要比普通军事斗争复杂艰苦得多 …… (65)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七日)
- 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 …… (68)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 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西藏工委的考虑 …… (73)
-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 团结起来 战胜困难 …… (75)
-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 克服享乐思想 反对铺张浪费 …… (87)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日)
-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报告提纲 …… (89)
-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 在《解放西藏进军纪念》册上的题词 …… (98)
- (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
- 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 …… (99)
-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
- 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104)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 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地方都易于克服困难 …… (109)
-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 学会管理城市 加强农村工作 …… (110)
- (一九五〇年三月六日)

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题词	(122)
(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	
西南工作情况	(123)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	
关于保障云南对外贸易任务的意见	(129)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	
现阶段西南党组织的三项工作	(130)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	
关于部队缩编的两个问题	(137)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	
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	(141)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日)	
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	(144)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	(146)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51)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要注意保护重要民主人士	(157)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为六一儿童节题词	(158)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	
以十条条件作为和平进军西藏的谈判基础	(159)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日)	
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	(162)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163)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对调整工商业问题的意见	(173)
(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	
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	(174)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对康东政权组织形式的意见	(176)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	(178)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七日)	
应限期收兑藏洋	(181)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	
金融税收政策是关系团结藏族人民的政治问题	(183)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九周年题词	(185)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团结和依靠群众建设新西南	(186)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	
今天保护机密比过去更重要	(190)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	
在减租中退押租的办法	(191)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纪念册题词	(193)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194)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	(206)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	
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	(213)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	(216)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对成立东藏自治区域人民政府的指示	(225)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	
务必注意各地农协的组织和领导问题	(227)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民族杂居地区不要急于搞减租退押运动	(228)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为西南军区第一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题词	(230)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	
发扬积极因素 战胜消极因素	(231)
(一九五〇年九月七日)	
关键是把党的组织整理好	(239)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吸收藏族优秀青年参加人民解放军	(242)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关于农业税率问题	(244)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学员题词	(246)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关于西南党的组织发展和巩固	(247)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开国一年在西南	(253)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	(257)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	
在欢迎英模晚会上的致词	(259)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昌都战役后的工作要点	(261)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妥善解决西藏纸币问题	(264)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西康藏区工作的请示	(26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	
文件太多的问题应加注意	(268)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	
谨慎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减租退押和土改	(269)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少数民族地区的减租土改要具备条件才能进行	(272)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	(274)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重庆工商》创刊题词	(285)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为新华书店西南区分支店会议题词	(286)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287)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	(299)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新年题词	(308)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	
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	(309)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	
为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一周年题词	(313)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关于减租退押工作情况的报告	(314)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对西康省一九五一年工作任务的两点意见	(317)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	
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	(318)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	(327)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对党外人士应该多做工作	(338)
(一九五一年二月六日)	
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	(340)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348)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为重庆市总工会成立题词	(354)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的经验 必须加以重视	(355)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56)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减租退押运动中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365)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为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题词	(369)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370)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374)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指示 (375)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 各种会议都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 (377)
-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 为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题词 (378)
-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 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
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 (379)
- (一九五一年六月八日)
-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
报告要点 (382)
-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
- 关于西南公教人员工资标准的意见 (388)
-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
- 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 (389)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 关于西南局工作情况的报告 (407)
-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 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412)
-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 灾区工作应以战胜灾荒为中心 (418)
-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
- 土改、镇反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 (419)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
- 土改斗争要有方法有策略 (422)
-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 为西南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425)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新形势下的军队干部工作	（426）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反霸必须贯穿于整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432）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	
西南区清理积案和第二期土改情况	（433）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精简军队 增产节约	（436）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抗美援朝已取得胜利	（439）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爱国增产 厉行节约	（442）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西藏军区人选及机构的意见	（445）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二年的工作任务	（447）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各项主要工作	（452）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关于三个会议情况的报告	（463）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坚决进行“三反”斗争	（466）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	（471）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扩建机场万勿浪费民田	（478）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应以庄严朴素为主	（479）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各级领导在“三反”中要带头反省	(481)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在三反运动中掌握领导完全必要	(484)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小城市也要进行五反运动	(486)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三反运动的有关政策性解释	(488)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关于处理“三反”、“五反”新问题的请示	(490)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加强民族团结 改善人民生活	(494)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宣传《婚姻法》 反对封建思想	(502)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	
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504)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512)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为西南区首届体育运动大会题词	(513)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三反五反运动应防止“左”的偏向	(514)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试行在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	(518)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土产业输出问题值得严重注意	(519)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对昆明市“五反”退赃计划的意见	(520)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西南是交通第一	(522)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当前的经济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后的建设工作	(524)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	(530)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为《重庆日报》创刊题词	(541)
(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	
加紧搞好西南工作 迎接全国计划经济建设	(542)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	



在西南局工作时期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工作中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



邓小平和贺龙在一起(一九五〇年)





邓小平在重庆欢迎赴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一九五一年)



邓小平和西南军区高级干部合影(一九五二年)

减租退押运动中必须 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各省区党委并报中央：

根据最近一个时期四川几个地区清匪反霸^[1]减租^[2]退押^[3]运动和土改^[4]实验情形来看，由于恶霸匪首分子大批遭到镇压，由于群众在斗争中进一步受到教育，并开始得到大批的经济利益，农村斗争确已进到更加普遍深入的阶段。一方面，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斗争性更大的提高，群众卷入斗争的范围更广大，给予地主恶霸政治经济上的打击更重；另一方面，地主恶霸势力的反抗挣扎亦来得更厉害。我们的方针无疑是继续放手深入发动群众，打垮地主阶级的一切反抗挣扎的企图，保证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的完全胜利。但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地主阶级并适当地解决贫雇农问题，在斗争策略上更好地分化敌人和孤立敌人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在运动逐步深入中，必须对下列问题引起注意，才能使运动始终纳入正轨，避免运动在后期可能产生的一些偏差。

第一，凡属经过退押的地方，大都着重于在惩治不法地主上做文章，藉以进一步地削弱大地主和一部分中等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同退押一样会广泛地牵涉到城市工商界。据川北阆中材料，兼地主的城市

工商业者大部分在农村都有违法事件，都在被处罚之列，不少地方农民像退押一样进城找工商业者要罚金，有的还因为工商业者比较容易拿出钱，因而在罚金数目上订得较大，也有罚了一次又加一次的。因此，工商界反映心里无底，影响到一部分人经营的积极性。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反映，要知道退押时间较短，而惩治违法地主是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时间很长。如果因此而影响到工商业者经营的积极性，甚至大批歇业，这对国民经济对农民都是非常不利的。在退押阶段，城市工商业者是退得较快的，在尚未退押的地方，仍应鼓励他们早日退清，割掉封建尾巴，但在违法问题上，则应主动地照顾一下资产阶级，使他们感到有底，以便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势力。在方法上应普遍采用阆中的经验（已转各地），即经过工商联的组织，由兼地主的工商业者自报在农村中的违法事件，包括隐藏地主和反动派的财产在内，自认处分或罚款，然后公议从轻处罚。处罚的数目以不得超过其违法数额的一倍到两倍，只能按违法的轻重、不能按财产的多寡确定罚金。有的则只向农民认罪，不科罚金，总以不使工厂商店关门为原则。再者，城市的工商业者兼地主与地主兼工商业者的界限很难划分清楚，我们对于两者的工商业部分，都应同样对待，只须追究地主将在退押土改中应交给农民的东西逃避到工商业的那一部分。我们这样处置，有些农民是会有意见的，所以需要耐心地向农民解释清楚，说明只有这样处置，才真是符合于农民利益的。

第二，在退押中，一般小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退得较快较好，在运动中打得也最狠。对于减租退押中守法的小、中地主，在处理违法事件时，则应加以适当照顾，从轻处罚或不科以罚金，只向农民低头认罪。我们有些地方在处理违法事件中，往往因为这一部分地主好搞，而把斗争的矛头仍然对准他

们。这一方面从政策上看不出守法与不守法的区别，看不出守法有什么好处，自然要增加地主顽抗的心理；另一方面又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在以往运动中打得不重的大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且易在运动中形成僵局。要告诉各级党委和干部，在凡属退押运动大体告一段落，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区，必须在策略上明确地区别守法的和不法的，使守法的感到有底、有好处，才有利于鼓励地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变成新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才不至于为反动分子所煽动，铤而走险。区别守法与不法，就是在大地主中也是重要的。

第三，根据有些地方的经验，只要我们能将矛头主要集中于违法的大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而对违法的兼地主的工商业者和小地主从轻处分，仍是可以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的。而我们从地主阶级身上搞出一批果实给贫雇农，藉以充分发动贫雇农成为农村的领导力量，这是不能动摇的方针。凡是对这方面注意不够的地方，必须切实检讨和纠正。

第四，最近发现有些地方采用“算剥削账”的方法，适用之于说理斗争，启发农民阶级觉悟是可以的，但作为地主赔账的计算方法，则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种方法更使一般人感到无底，且易使运动难于掌握，形成混乱，所以必须坚决纠正。至于把算剥削账的方法用之于城市，则更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第五，凡属退押和违法处置业已基本结束且已适当满足了贫雇农要求的地方，除了少数必须继续追究外，对于一般地主则应从“少”、“不”^{〔5〕}两字加以调整，从速结束退押和违法处理，禁止节外生枝。这样不但可以安定绝大部分地主，而且不致助长农民的侥幸心理，便于鼓励他们转入生产，从自己的劳动中发家致富。

第六，由于西南各地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上述这些规

定完全适用于那些业已基本完成退押并适当地满足了贫雇农要求的地区。这种地区应把这个指示发到县委。至于那些退押运动还在初期的地区，则暂时还不宜传播下去，以免障碍这类地区运动的开展。

西南局

四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 〔1〕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2〕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3〕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5〕“少”、“不” 见本书第212页注〔11〕。

为重庆市第一届文学艺术 代表大会题词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

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需要更多的与他们有切身联系的为他们所乐见乐闻的作品。

邓小平敬题

根据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保
存的手迹刊印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三四两月全区斗争最为紧张，农村退押^[1]、惩治违法地主和第一期土改^[2]，镇压反革命^[3]，抗美援朝^[4]三大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中央局^[5]在三月下半月开了统战工作会议，四月下半月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总结另有专门报告，不在这里叙述。

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6]退押运动，去年七月着手准备，十一月全面展开，到今年四月中旬为止，已在二百零八个县、七个市郊，六千六百六十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只有云南大部，贵州二十个县，川西、西康^[7]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或不应进行，云南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运动规模较大，斗争异常剧烈。预计全区可得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的果实七十七亿斤米，已经到手的约六十五亿斤米（实际上要多），其中又以川东可得二十五亿斤已得约二十二亿斤为最多，川西可得十五亿斤已得十二亿斤次之。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万余人，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八，人民武装已发展到二百二十四万余人，占人口百分之三。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批农

^{*}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节录。毛泽东在5月16日转发各地的批语中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在报告里面，毛泽东还附注了自己的意见。

民积极分子。特别在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这样才奠定了分配土地的可靠基础。总起来看，农民是真正翻身了，农村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下乡的民主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历史奇迹，异口同声地说城市落后了。

在“淮海战役”的基础上，我们又在今年二、三、四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第一期土改范围为十八个县又十二个区和一百五十八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毛注。）地主顽强抵抗，放火、放毒，杀积极分子，搞暴动等等事件比过去多得多，斗争异常激烈。那种认为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就可以和平土改的想法，已为事实所粉碎。

经验证明，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才不致煮夹生饭。我们决定，必须从退押特别是从惩治不法地主的斗争中，一方面进一步搞垮封建，一方面使贫雇农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从而发动贫雇农，改造农会领导成分。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各地这样做了。不少地区贫雇农获得了每人一百斤米左右的果实，有的地方相当于中农所得的果实，多数乡村贫雇农取得了农会的主要领导地位。所以，凡属完成了土改的地方，农村基础更加强固，煮夹生饭的比重不大。在以后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体会这个经验，坚持复查减租退押，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

导成分这个明确的方针。

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关于镇反问题已作了几次报告，最近情形，周兴^[8]同志到京面陈。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做得很对，但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我们已告各地注意克服。

此外，（一）抗美援朝运动，四月份已普及到农村，签名者已达三千三百万余人，参加“五一”示威者二千一百九十余万人，还在继续开展中。（二）第一期扩兵九万只川东（五万）、川北（四万）两区进行，反映很顺利，费力很小。（三）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四）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

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 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毛注。)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退押 即退还押租。见本书第192页注〔5〕。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4〕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5〕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6〕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7〕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 and 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8〕周兴 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西南分署检察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

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
退检署。

邓
五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 这是邓小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西南分署一处清理反革命案专题报告》上的批语。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政权建设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云南省人民政府并报政务院：

五月四日电悉。

一、经过各族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政府委员会的专区应否定为一级政权问题，我们考虑结果，认为这种专区仍不宜定为一级，而与其他专区一样是省人民政府派出的督导机关。建立专区级政府委员会的目的，是在于团结各族代表人物参与政事，便于使上级政令能在各族人民中顺利推行，又便于解决各族人民之间的问题，达到团结之目的。不把这种专区定为一级，也不至于妨害这种目的；反之，如果定为一级，增加政权层次，则有侵越省政府和代替县政府职权，有上下隔离，降低行政效能之弊。

二、专区各族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为听取和审议专员（代表委员会）关于执行省政府各项政令情况的报告，讨论有关各民族间的团结问题和关系于全专区性质的地方行政问题，选择专区人民政府委员会。这种代表会议定为一年一次即可，遇有重大问题则召集临时代表会议。专区的经常领导集中于专区人民政府委员会。

三、专员、副专员仍应由省政府任免，专区代表会议只选

择委员会委员，由省政府批准任命。专员、副专员为该委员会之当然的主席、副主席。这样才能与专区及省之督导机关的行政体制相符合，人事调动也较灵便。但为了照顾民族团结，专员或副专员的人选，要尽可能地物色少数民族中的适当人物充任。

四、专区、县区乡各级联合政府与其他地区一样全称某某专区（或某县某区某乡）人民政府，及人民政府委员会，不必加上各族二字。联合政府的实质表现在委员会委员及代表会议代表的名额是按照各族人口比例选派的，在政治上各民族是平等的。但在讲话中应多注意提醒这就是各族人民的联合政府。

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县区乡，全称某县某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某县某区某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某县某区某乡某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律简称某县（区乡）人民政府。

六、上列五条意见连同云南省府五月四日电报一并呈报政务院，请予以审核批示，一边通令全西南各地一体遵行。在政务院未批复前，云南省府可依上列指示试行。

西南军政委员会

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各种会议都出专刊 往往过于形式主义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致钦岳^{〔1〕}、胡光^{〔2〕}同志：

鉴于多次经验，各种会议都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很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疼，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请你们与司法部一商。

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
敬礼！

邓小平
五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 钦岳 即周钦岳，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2〕 胡光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为西南民族学院成立暨 第一期开学典礼题词^{*}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各兄弟民族团结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周围，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繁荣幸福的新中国。

邓小平敬题

根据西南民族学院保存的手迹刊印

^{*} 西南民族学院于1951年6月在成都成立，2003年改名为西南民族大学。

在西南各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 办法协议签字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六月八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祖国的首都北京正式签字了。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立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这是在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召之下，全国民族大团结的胜利，这是《共同纲领》^{〔2〕}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对于协议的商谈签订，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和阿沛·阿旺晋美^{〔3〕}为首的西藏政府地方代表团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感谢的。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也侵入西藏，他们千方百计企图使藏族人民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残暴地压迫和剥削全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民。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采取挑拨离间藏族各部分的手段，以达其奴役藏族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则利用藏族对满清政府、国民党政府的仇恨情绪培植藏族中的分离主义者，以达其侵略目的。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藏族和汉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族内部也是不团结的。由于受历代反动政府的压迫，以致西藏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长期陷于停滞衰退的境况，人民

生活愈来愈贫穷愈痛苦。这是帝国主义和历来的反动政府侵略压迫的结果。

现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达成了，这一协议的签订，给予西藏人民的历史以及西藏人民与祖国关系的历史，带来了划时期的变化。依据已经签订的协议，西藏人民即将获得和平解放，从而永远脱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奴役，永远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人民即将从黑暗境遇转到光明，人口将逐渐增多，经济将逐步发展，人民生活与文化将逐步得到改善与提高。这是可以肯定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4]、西南军区将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决地贯彻执行协议，加紧准备并动员西南全体人民支援入藏部队，以巩固国防。严格教育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及一切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协议，遵守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严守纪律，努力帮助西藏人民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人民有所要求时，亦将根据协议所定，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最后，正如毛主席所说，藏族与汉族的团结，藏族内部的团结，只有在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有实现的可能。今天在毛主席的伟大感召下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达赖喇嘛^[5]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6]所领导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中国境内各兄弟民族空前团结起来，西藏内部也空前团结起来，多少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从此基础出发，我们将看到侵入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被彻底驱除，将看到祖国在西藏地区的国防得到巩固。

我们坚信，在以阿沛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和一切藏族爱国主义者的努力下，协议的全部规定必能顺利实现。我们热烈地祝贺西藏人民的和平解放，祝贺藏族和国内各民族的光明幸福的前途。

西藏的和平解放万岁！

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各民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6月9日刊印

注 释

〔1〕《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等等。

〔2〕《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3〕阿沛·阿旺晋美 当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往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

〔4〕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5〕达赖喇嘛 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6〕班禅额尔德尼 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

一、抗美援朝^[1]、土地改革^[2]和镇压反革命^[3]等三大运动都按计划进行，发展是正常的，成绩是很大的，干部是很努力的。在土改（退押^[4]与惩治不法地主）与镇反的后期，有简单粗糙的毛病，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又在滋长。我们在领导上则有控制不严的缺点，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二、抗美援朝不是一个临时的或附带的工作，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具有革命根本性质的任务，必须坚持努力，继续贯彻和深入下去，防止“差不多了”的倾向。

经验证明：抗美援朝运动对各种实际工作推动很大，今后必须按照中央六月一日指示，认真领导各阶层群众订立、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使之成为树立坚固的爱国思想和经常地推动实际工作的形式。

捐献飞机、坦克、大炮的运动必须大力推行。西南应以捐献三千亿元^[5]为目标（每人五斤到八斤米）。这样一个大数目，没有深入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办不到的。对于军属烈属的优抚工作务必做好。为了经常地领导抗美援朝运动，必须把抗美援朝会充实与加强起来。今后不宜多开大会（没有开过的地方还应开），而应在每个具体工作中，密切联系到抗美援朝去

进行。

三、土地改革运动应按计划进行。对清匪、反霸^[6]、减租^[7]、退押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应有领导有计划地加以检查和处理，处理的主要目的是：（一）进一步发动贫雇农，树立贫雇农的领导，并坚固地团结中农；（二）安定各阶层的情绪，分化守法的地主，以便孤立和打击顽固的地主；（三）引导各阶层努力生产，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发动贫雇农的程度如何，是衡量农民运动的深入程度的主要标志。在土改完成了的地区，必须注意使地主阶级特别是处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安定下来，专门召集他们开会，训示他们不要造反，不要胡作乱为。同时，认真监督和帮助他们劳动改造，给以生活出路。其中能当教员的，可选择一部分分配以教书的工作。处理地主有关退押违法的遗留问题，应尽快结束，原则上对小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放宽，采取“少”、“不”两字解决，对于一部分中地主采取“缓”、“少”两字解决^[8]，对于守法的大地主也不宜节外生枝，对于那些顽抗的大地主必须坚持斗倒，但应宣布退罚数目，使之心中有数。无论大、中、小地主，凡是了清了问题的，必须出榜公布，开会宣布他们所余底财^[9]、浮财^[10]均为其本人所有，允许其自由经营正当的事业，并依法获得保障。

对地主的遗留问题采取这种政策，可以大大安定富农乃至中农的情绪，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很大好处。而且也可以使地主心中有数，较快地拿出该拿的东西，藉以继续解决贫雇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问题。

准备在秋收后解决分山、分塘的问题。

完成了土改的地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教育和建政。

四、镇反应坚决按照中央公安会议^{〔11〕}的方针和西南局五月二十三日所订计划执行。

严密地控制运动，下面不得机动。组织力量将现押人犯在六七八三个月内基本上清理完毕，认真组织劳动改造。工作方法上严禁草率粗糙，脱离群众。必须认真根据北京市的经验，吸收党外人士参与镇反工作，经验证明这样做有利无害，不这样做是错误的。中层^{〔12〕}问题，在四五两月整风中，专署级以上机关大体上摸了一下底，应继续进行精密的调查研究，准备材料，以便于今冬明春弄清中层问题。县级暂时不搞。但公安机要部门则不能等待，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对反革命的警惕，防止松懈麻痹。

五、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对于农业生产的领导。指定专人专管这件工作，随时检查、发现问题和及时解决问题，特别是注意帮助贫雇农解决生产中的困难问题，保障今年有一个好的秋收。对夏荒要认真注意。

六、由于农村土地改革引起了经济情况的巨大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去逐步地解决。现在的情况是：（一）农民获得减租、退押果实超过七十亿斤米，大约还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农民手中，急需找寻出路，现在多买多存粮食，引起了粮食市场的恐慌；（二）产品普遍不够市场的需要；（三）城市的产品多不合农民的需要，农民要的城市又没有；（四）私营工商业大部还未得到改造，公私关系在有些地区还未妥善解决，故私资经营积极性还未充分发挥起来；（五）国营经济的发展不如私营经济发展得快；（六）土改后地主还有不小力量投到经济事业中来；（七）有一部分工商业转到了农民手中，如不好好组织，有被破坏的危险；（八）农业经济由集中到分散，百分之六七十的新分得田地的贫雇农的

生产资料极端缺乏，如不注意扶持，不但增产困难，且有减产危险；（九）我们现有的经济机构和力量远远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如不注意，有控制不住的危险。

解决的办法，目前要从下列几点着手准备和开始进行，才能避免盲目性，才能逐步地解决上述新问题。这些办法是：（一）在完成了土改的地区，应把建立合作社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为了连接城乡，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地位，减少私营商业对于农民的中间剥削；同时也为了引导农民的果实使之用于有利的方向，引导农民走向集体主义，合作社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环节。为了避免走老区的弯路，新区的合作社必须坚决地按照合作社章程所定原则去组织，今年不可能大量建立，但应着手训练干部，进行宣传，创造典型，积累经验，准备明年大发展的条件。（二）在目前建设大工业尚有困难的条件下，应注意发展公营的小型工业。我们已有一部分资金准备投入地方小型工业，这是一个不小的力量，应有计划有领导地去建设，纠正某些同志只想搞大的不想搞小的这种不正确的倾向。（三）由于市场的刺激，私人手工业已有相当的恢复，有的还有了一些发展，应重视这个力量，好好地加以组织和领导。（四）加强财经委员会及工商部门对于工商业的指导，避免盲目性。对于私营企业的改革及公私关系的调整，仍应按已定方针认真进行。（五）扶持贫雇农应视为党和政府在农村的长期方针。（六）党委加强对于经济工作的研究和领导。

七、学校教育方面的混乱状态必须结束。严格禁止随便招生，一切经过人事部和党的组织部。现在普遍存在随便占用校舍，随便给学校师生派差事，随便调教员调学生，过多的会议和劳作使学生疲惫不堪，无法学习，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现在

高中学生太少，今年秋季大专学校须招收新生一万一千名，而高中及相当于高中毕业者尚不足六千名，这种脱节现象，必须设法克服。小学普遍增加，大多增至一倍到两倍，教员极缺乏，应计划从地主子弟中改造一部分，调至外县当教员。由党的宣传部及青年团负责组织和领导小学教师联合会的工作。

八、干部工作。土改完成之后，土改干部的绝大部分，调合作社、银行、贸易、工业等做经济工作。大批培养农民的积极分子和乡村贫苦知识分子担任区乡政权民运工作。一九五二年西南各部门需要补充八万干部，应即由组织部拟定计划，分由各区招收和训练。

九、整党工作除云南应按省委计划稳步进行外，其余各地均应于今冬开始，明春完成。在城市及完成土改的农村，应按全国组织会议决议，稳步地进行党的建设。

十、党的领导经常注意在思想上防止骄傲自满情绪，在组织上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在工作中反对命令主义。坚持运用各种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去进行各项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2〕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3〕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4〕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5〕三千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6〕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30页注〔3〕。

〔7〕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8〕见本书第212页注〔11〕。

〔9〕底财 指当时地主拥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

〔10〕浮财 指当时地主拥有的金钱、首饰、粮食、衣服、什物等动产。

〔11〕中央公安会议 指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总结1950年10月以来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谨慎收缩的方针，部署镇反斗争任务。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12〕中层 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关于西南公教人员 工资标准的意见^{*}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

我以下面理由改定为才六十五德二十五资十的比例：
（一）以才为主才能奖励前进，做好事情。（二）但德是发展才能做好事情的基础，故加五。（三）资百分之十够了，特别在旧人员中，有资格的人往往是最没有用的人。特别在新区，将德提高一点是必要的。

邓
六月十四日

余均同意。此事须报告一下中财委^{〔1〕}。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工资问题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三十周年了。为使所有的党员、团员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党，今年的纪念主要放在教育上面。今天我讲四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是中国革命最精华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从苦难中站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近百年来是灾难深重的。在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是英勇的，但因为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结果站起来又被敌人压下去。五四运动^[1]才给中国开辟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标志，不能设想没有一个代表中国人民——首先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坚决的革命的政党，可以把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正因为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所以从那一天起，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向胜利。我们的党在成立的宣言中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心来领导中国人民，从第一天起党就不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今天证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的报告。

的。

为什么中国人民革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其胜利的标志？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最进步的、最有纪律性与组织性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党内还有一些党员不知道这一点，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或农民的党，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党的历史，缺少马列主义的思想。党是从什么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从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没有工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政党，而没有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得到胜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也不可能获得解放。有一些党员因为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热情很高，在战争岁月中，农民拿出自己舍不得吃的粮食，送他们的子弟参军，似乎农民比工人阶级更先进一点，觉得党内最多的成分是农民，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个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农民是英勇的，但农民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是世界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农民必须跟着工人阶级走。同时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到彻底解放的道路。历史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斗争，都没有获得成功，这正是由于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缺乏纪律性与组织性，对革命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和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农民要成为有纪律有组织的队伍，制止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近代的农民运动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三十年来，中国农民之所以坚决英勇，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时今天在打败蒋介石、打败帝国主义以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也不可能巩固革命的成果并继续进入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土地改革^[2]以后，按照列宁的说法是农民无时无刻不在生长着资本主义。显然，农民的经济若没有工人阶级的

领导逐步达到集体化，那么广大农民仍不能得到解放，已获得的果实也仍将丧失，仍然要走上贫困破产的道路。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也只有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走上集体化，才能使他们从经济文化的落后地位彻底解放出来，生活富裕起来。所以认为我们的党是农民党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抱有这样认识的党员连起码的党员知识都没有，假若不改正就要掉队。有的农民党员土改后满足于“三十亩田一头牛”，不愿再前进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样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党员认为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及许多领导同志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一样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地革命，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动摇性。党内的“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即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的反映。不能设想，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时而“左”时而右的政党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错，党的有些领导者确实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彻底改造过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经过这样的改头换面，革面洗心，既不可能是一个好党员，更不可能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

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头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3]。所以工人阶级革命是最彻底的，而且由于大机器生产锻炼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最有前途的。农民不可能这样，农民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支援下造出许多拖拉机、电站及近代化的水利工程，农民才能彻底地解除贫困与落后。所以无论工人也好，其他人民也好，其前途与幸福必须建筑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工人阶级就代表了人民的光明与前

途，是最彻底与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则是这一阶级最觉悟与有组织的部分，党员必须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否则就不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对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一样要以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他们，才能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

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这样一个最集中、最有组织纪律性、革命最彻底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领导，才使中国革命经过三十年的奋斗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并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快乐、幸福、优越的。我们的党代表着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只有我们的党才能领导而且正在领导其他阶级纠正错误，走向胜利与光明。

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党就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呢？还不够，还必须要马列主义的武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党在未成立之前就有许多马列主义小组，如毛泽东同志等就是当时这些小组中的一员。这说明创办我们党的同志一开始就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一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担当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责任，就以马列主义来教育培养自己，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规定了革命的战略、策略和工作方法。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我们前进。三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目前它有五百八十万党员，是一个真正具有群众性的党，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正引导着中国人民建设新的社会，并将继续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就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又是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方针与口号，并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假若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方向，也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与任务，以后又一次一次地完备起来，这是因为吸取了世界革命特别是苏联革命的经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列宁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士的作用。马克思说，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6]。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党就密切联系了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建立那天起就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而且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形成为无比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假若不与各国实际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教条主义^[7]。毛泽东同志首先是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变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东西，变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

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而现在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就是因为我国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变成中国人民自己新鲜活泼的东西。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而有的时候是失败并使革命受到了挫折，其道理就在于，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变成新鲜活泼的东西呢，还是变成死的教条。

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当中大体是正确的，虽然那时党还幼稚肤浅。但到一九二六年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8]，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和革命。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陈独秀看不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不敢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革命，却只看到了上层人物与敌人的进攻，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动摇了，使革命遭受挫折。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代表了革命的正确方向。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才使中国革命在受到挫折后又走上正确的方向。继后是十年的农民革命战争，或称土地革命战争。在此期间又有李立三“左”倾机会

主义路线^[9]，接着又是教条主义统治我党四五年^[10]，致使白区的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十分之九。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居于领导地位，正确的方向未能得到坚持，而教条主义以马列主义的词句作外衣，迷惑了许多党员，致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不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就受到重大损失。

这些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是沉痛的，但我们的党终于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这些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在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全国各地都受到损失，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方没有受到损失。正是由于事实摆在党的面前，使同志们认识到，由于有毛泽东思想才战胜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11]以后的十七年更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斗争是艰苦的，牺牲了许多同志，流了许多血。老同志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他们深知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痛苦，同样也了解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幸福。百分之九十八的党员没有遭受到革命的挫折，但经验证明：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懂得，党一旦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遭受挫折，吃了很多亏，懂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能设想经过三十年而有今天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丰富极了，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用之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团员，应该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与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通过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走向更大的胜利。党章^[13]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

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如果党员要想少犯错误，要前进得更快，不致迷失方向，就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统一的思想。斯大林说过，马列主义理论强有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能预察世界的进程，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会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1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有一切带普遍性的问题，都可以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宝库中取得。如果我们取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不致思想不通，不会说党是农民的党，不会只满足于“三十亩田一头牛”。如果共产党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起码的知识，那么对党中央的每一个号召、指示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就不会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当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是很丰富的，不可能所有党员都能懂得全部，但只要懂得了基础，就可以少犯错误，在工作中的力量就比不懂的人的力量大得多，特别是在紧要关头不致迷失方向。我们许多同志犯错误就是缺乏理论学习之故。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为马列主义的宝库中增加了更多丰富的内容。对于五百八十万党员来说，绝大部分党员缺乏理论修养，这是党的最大弱点。当然，集中的统一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有高度的马列主义修养，有无比的威信与力量，这大大增强了党员的信心，并能使党员从工作中学到一些毛泽东思想。但是有些同志满足于现实的工作成绩，缺乏学习理论的空气，因此在执行政策中忽“左”忽右，一时是命令

主义，一时是尾巴主义，时常出现错误。对一个党员来说，缺乏理论应当是可耻的。毛泽东同志从来都是重视理论的，我们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此目的，党中央已规定了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计划，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两三年后大部分党员都要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更有成绩，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三、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这是每一个党员联系群众必须遵守的原则，是衡量党员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每个党员必须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我们的党员是不是倾听群众的呼声，向群众学习，并以革命精神来教育启发群众；是不是时刻警惕自己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否存在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都是值得重视的。党章规定每个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的，这也是党员的品质问题。

三十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不断领导群众走向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党不仅从未脱离群众，而且为群众制订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纲领，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正因为我们党联系群众，所以人民群众，首先是劳动人民群众响应与拥护我们党的号召，并信赖我们党三十年如一日，不断将最优秀的部分输送到我们党内来，使党由几十人、几万人发展成为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群众性的大党。也正因为我们联系了群众，所以我们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也仍能站立起来对敌人进行斗争，并不曾失去斗争的信心。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大革命的失败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未因反革命的屠杀而被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自己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15〕}！无论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或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我们之所以有信心，除了由于有伟大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外，还有群众的支持，否则，我们的信心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为什么我们党能有群众的信任呢？首先是由于我们党革命斗争的纲领、方针、策略和工作方法的正确，它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是由于党员成为执行此斗争纲领、方针的模范。党员站在人民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更不是站在群众之上，所以群众认为党员是他们最忠实的好朋友。如果党员站在群众之外，或站在群众之上，企图以命令来指挥群众，那么，党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如果我们不善于发动群众，一面当群众的学生，一面又当群众的先生，引导农民运动不是由低到高一步步前进，和农民讲清道理，那么他们就不会跟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的党是个农民党，只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那么也就不可能继续领导农民前进。我们必须告诉农民，在土地改革之后必

须走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支持工人，发展工业，建立工农联盟；同时取得工人的援助，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使农民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走这样的路，人民生活才能逐步提高。因此，我们如果团结了群众，又领导了群众，那么我们就能永远和群众一起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小集团或自己个人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适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把联系群众作为我们一切思想行动的出发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任务、政策必须是“从群众中来，而又到群众中去”〔16〕；一切必须来自群众，但同时又必须加以集中、批判和提高，再回到群众中去。因为受小资产阶级和几千年封建社会统治的影响，群众有局限性。如农民吊打地主，我们应该劝止，应说服和教育群众。可是我们有些党员，在纠正了命令主义之后，又变成尾巴主义，他们不加劝止。这是党员的错误，

不是农民的错误。要知道，尾巴主义是不可能领导群众前进的，联系群众是我党党员品质的标准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批评我们党部分党员脱离群众时说，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的原则，这就是倾听群众意见，要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的原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为了防止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应该跟别人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敌人汉奸以及破坏抗战与团结的人们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同志们，我们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现在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们应该很好地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如果犯有这种错误，就应该很快纠正。今天在抗美援朝^[17]、镇压反革命^[18]和土地改革运动以及经济、文化建设等工作中，如果和党外人士合作得好，事情就会办好。否

则，我们的工作将受到损失，甚至遭受失败！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上说，如果党竟在自己狭隘的党的范围内闭关自守，如果它竟与群众隔绝，如果它竟蒙上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必遭灭亡。布尔什维克党只要是与广大民众保持着联系，就会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定理。反之，布尔什维克一脱离群众，一失掉自己与群众间的联系，一染上官僚主义的尘垢，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接着斯大林同志谈到在古代希腊人传说的神话中，有一位叫做安泰的著名英雄。他的父亲据说是海神波赛东，母亲是地神盖娅。他对于生育、抚养并把他教育成人的这位母亲爱慕备至。安泰很有力量，没有哪一个英雄能与他抗衡。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敌英雄。为什么他这样有力呢？原来他和敌人决斗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即往生育和抚养了他的母亲的身上一靠，因而就取得一股新的力量。但他终究有一种弱点，就是生怕别人用某种方法把他跟地面隔开。敌人知道他有这种弱点，于是时时刻刻暗中窥伺他。后来忽然有个敌人，利用了他这种弱点，结果把他战胜了。这个敌人就是盖尔古里斯。原来他把安泰跟地面隔开了，把他举到了空中，竟使他无法再同地面接触，结果便在空中把他扼死了。斯大林同志最后说，我认为布尔什维克颇与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相像。他们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而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母亲，即是与生育、抚养并把他们教导出来的群众保持着联系。所以他们只要还是与自己的母亲即民众保持着联系，那他们就能始终稳有把握地保持住他们那种不可战胜的地位。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坚强有力而不可战胜的关键。我认为斯大林同志说的这个真理，不仅适用于联共党，适用于中国党，而且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

四、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前面说我党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这主要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指党的组织和许多优秀的党员执行了中央的政策，即是从党的整体来说的，而并不是说我们每个党员都是伟大的、光荣的和正确的。朱德同志说：我们的力量是表现在组织上。如果拿一个党员来说，不见得比党外人士强。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人人都有缺点，不过程度各有不同。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些缺点，就可以不断前进。任何党员都不应该自高自大，自吹自擂。目前，许多党员缺乏学习理论的空气，少数党员甚至对政治缺乏兴趣，特别是在经济建设进入高潮的今天，少数同志认为只要把业务搞好就成，因而工作上往往迷失方向。

联系群众虽然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并因此取得群众三十年如一日的信赖，但并不是说我们每个党员都能联系群众。事实上我们党内还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在军队中甚至有军阀主义，个别干部还有打人的现象，此外还有关门主义、不愿和党外人士合作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党内曾对这些非无产阶级和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斗争，当然是以教育为主，使这些坏倾向不能发展，使党内保持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党是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但同时党内还有自由主义，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甚至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于违反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未进行坚决的斗争，有时为了熟人的面子，或怕别人揭发自己的错误，因而发展了自由主义。老党员过去在极危险时加入党，经过锻炼，这是好的。但胜利后有个别同志骄傲自大，闹生活待遇。今天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防止骄傲自

大和腐化的倾向发展。

现在加入共产党，很少冒着生命危险，所以吸收党员要更严格。同时要注意对老党员的教育。党内还可能混入个别的坏分子，对于这些人，必须加以清洗。刘少奇同志号召全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最近党中央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形成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19]。

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这八个条件，特别是今天，党已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对党员的要求要更高。过去在战争环境，学习马列主义有困难，而现在到处都有马列主义的书籍，有时公家还发给我们，所以有条件学好，也应该学好。今天处在胜利的环境，要求应当更加严格，对于那些不承认党是工人阶级的党、自私自利和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同志都必须进行批评教育；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当然，在执行中对于工人和知识分子应有所不同，对知识分子要更严格些，因为工人要把马列主义说得很有条理是困难的。但基本条件必须同样具备。

纪念建党三十周年，要总结的经验很多，我今天只提出：（1）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密切地联系群众。（3）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们在工作中才能少犯错误，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不会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迷失方向，也不会在胜利的形势下骄傲自大。骄傲自大只是表示他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还太少。只有提高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才能使他们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领导人民群众，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

的党员，比之苏联共产党员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纪念“七一”，必须永远记取三十年来党的斗争经验、教训和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的指示，并勇敢地向前迈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五四运动 见本书第363页注〔1〕。

〔2〕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286页）。新的译文是“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4〕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5〕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新的译文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6〕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新的译文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7〕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8〕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指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党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

统治。

〔9〕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10〕这里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者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11〕遵义会议 见本书第172页注〔5〕。

〔12〕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见本书第172页注〔3〕。

〔13〕党章 这里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6月1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14〕见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5页）。新的译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15〕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16〕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原文是“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

〔17〕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18〕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19〕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3月28日，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即：（1）中国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2）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共产党员必须一辈子坚持革命斗争；（4）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5）共产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6）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7）共产党员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8）要努力学习，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这八项条件写入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

关于西南局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并中央：

我们在六月上旬召开了中央局^[1]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各区负责同志都到了。会议的目的是检查一下最近四个月的工作，并提出今后注意的问题。在会议上我作了一个报告，经过讨论后修改批准了这个报告的要点。西南工作的情况是：

第一，第一期一千三百万人口区域的土改^[2]已完成，第二期两千五百万人口区域的土改已于六月初开始。从减租^[3]、退押^[4]、惩治不法地主中，农民已经获得果实七十三亿斤米。其中减租约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其余均为退押和赔罚所得。多数农民的经济要求已获得适当满足。占农民人口约百分之三十的无租可减、无押可退的贫雇农亦得到了部分的利益，使今年春荒得以顺利渡过，春耕生产得以顺利进行。但据川西材料反映：这些贫雇农每人需得一百二十斤米，才能解决生产资料问题。而现已得到的每人才约六十斤米，尚差一半，要从今后处理地主遗留问题中，特别是要从国家长期的扶植政策中不断地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在地主方面，大部分地主已经了清了退押和赔罚；一部分中小地主虽尚未了结，但确有困难，无法了结；一部分大中地主确有能力了结，但采用各种方法，包括利用我们的工作弱点，进行巧妙而顽强的抗拒。我们的干部对于中、小地主办法较多，而对于诡计多端的大地主办法较少。为

了多搞一点果实去满足农民的要求，往往一次又一次去整中小地主，运动后期吊打自杀现象因而增多。鉴于川南资中县的教训，在农民已经得到七十三亿斤米这个情况下，四川、贵州、西康^[5]各地均于四月底、五月初胜利地结束了退押运动，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时的。但各地都有不少有关退押、赔罚的遗留问题需要处理。这次中央局会议就明确规定了处理遗留问题的原则。一方面对于中小地主放宽，一方面对于那些顽抗的大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抓紧。这样做就可以使大多数地主安定下来，觉得可以过活下去，并帮助他们实行劳动改造。这样做，同时就把少数顽抗的大中地主和特务反动分子孤立起来，从而易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迫使他们拿出钱来，了结悬案，继续解决一些贫雇农的困难。从西南全局看来，我们经历了剿匪、清匪反霸^[6]、减租退押及镇压反革命^[7]三个大战役，对封建反动势力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对于反革命的要害打击得极不够。而我们在退押及镇反运动的后期，确有简单粗糙的毛病，打击面也嫌略宽了些，特务反动分子则利用这点鼓动少数地主顽抗，组织被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乃至儿童进行放火、放毒等等活动。有几个地方还组织了几十人的小型武装暴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对于那些已经全部或大部退了押、全缴了赔罚款的，以及确实退不起的小地主和大部分中地主采取经济上放松，但在政治上继续严格控制，不准地主阶级进行反攻的政策，分清守法与不法，明白是非界限，中和一下他们的反动情绪，缩小反革命活动的市场，以便于集中力量打击特务反动派，我们认为是适时的和恰当的。

第二，关于镇反问题已有多次报告不再赘述。现在各地正按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执行。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反工作，亦已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开始，收效甚好。有的地方正在做，

有的地方做了还未看到报告。我们已督促各地坚决这样做，不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次中央局会议一致认为镇反与退押土改结合收效极大，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及中央公安会议的决议。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我们认真地检讨了镇反后期控制不严的毛病，责任在于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局未能事先规定更好的控制办法，如中央规定五日一报那样的办法一样，我们把这点看作是领导机关的重要经验。对于个别地委、县委乃至区委那种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现象必须严格制止，不能助长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发展。

第三，中央局会议分析了党内现在的思想情况，认为各级干部工作都很努力，每一任务完成得都很快，成绩很大，进步不小，在工作中是团结、愉快的。但因为工作做得还好，正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部分同志在工作上没有开始时那样兢兢业业了，对于工作的或个人的缺点也不大注意去发现了。命令主义又在重新增长，吊打现象又重新增多，腐化享乐的思想又在抬头，甚至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也在发展了。这些虽是一部分同志和个别的组织所表现的倾向，但不注意是很危险的。而我们各级领导同志如果迷恋于成绩，对于犯有这些错误的同志和组织采取原谅包容的态度，把纠正这些错误即纠偏同泼冷水混同起来则是错误的。对于这些倾向，在四五月间的全区整风中已有一些揭发和批评，但一般是不深刻的。这要求西南各级领导同志随时注意在思想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组织上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在工作中反对命令主义。这是我们今后指导党内思想工作的重点。

第四，这次中央局会议，我们把两个问题放在了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上面。一为注意研究经济工作；一为克服现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在我的报告中对于经济工作只说了一

些情况，解决办法也不多，目的只在于引起我们的注意。学校教育中首先是乱招、乱调，学生中的混乱状态实际上已引起了广大师生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我们在六月初开始经过《新华日报》^{〔8〕}提出这个问题后，获得了极好的反映。我们正准备利用这个积极性进一步地推动学校工作的前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详细整理材料另行报告中央。

第五，这次会议我们讨论了干部缺乏的困难问题。据现在初步统计，今年年底以前必须训练出八万初级干部才能适应明年工作的需要。计银行、财政共三万，合作社一万，贸易一万，宣传系统一万，组织系统一万，其他一万。干部来源主要从农村中较好的知识分子和略通文字的农民积极分子中找。各地负责同志对此十分热心，正由有关部门拟定详细计划，然后指示各地实施。

以上作为我五六两月的综合报告。

邓小平

六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4〕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5〕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6〕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7〕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 298 页注〔11〕。

〔8〕《新华日报》 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1949 年 12 月 10 日在重庆创刊，1954 年 8 月 31 日停刊。

紧密地联系群众 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

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迎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日。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在幼年时代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一经出现在政治舞台，就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灾难深重而又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曾不断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但是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惟有我们党向他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惟有我们党依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规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是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对于我党的信赖，三十年如一日。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成为群众的榜样，他们成为群众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规模，它是那样地具有组织性和坚韧性，反动统治的屠杀不足以打散我们的队伍，无数次的

^{*} 这是邓小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发表的文章节选。

挫折不足以损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对于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系，正是这种血肉的联系，赋予中国革命以无限的生命力，从而取得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党与中国人民建立了这样深厚的联系，是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发表，无疑地将为中国党更坚固地树立起思想的和理论的基础，它是马列主义的光辉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杰出模范，是把列宁、斯大林建设和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原理，运用于建设和领导中国党的杰出模范。他千方百计地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些理论来灌溉我们的党，来教导我们共产党员。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正是以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和热爱群众的思想，领导全党战胜了各色各式的机会主义，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来自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色各式的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树立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正确的工作作风。

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这些指示的伟大性，正是由于他们基本上遵从了这些指示，才能在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出成绩来。而当他们违背了这些指示的时候，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在实际斗争中碰得

头破血流，并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

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们党的地方组织一般地都学会了“由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懂得如何把中央的方针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懂得把群众的反映当作衡量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是否正确的一面镜子，并据以改正自己的错误，洗刷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灰尘，改进工作方法。所以，党的方针能够符合群众的要求，党的口号立即变为群众的行动，我们的每一个具体工作任务都能在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基础上，战胜一切困难，扫除一切障碍，取得圆满的胜利，并在运动的每一步中，去耐心地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并领导群众继续前进。

我们的党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不但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一切运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是在我党领导最集中的革命军队的工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人民军队就是善于联系群众的榜样。在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方面，在集中的基础上，实行了恰如其分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的原则，从而彻底地清除了旧军队的军阀主义，高度地发挥了部队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巩固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增强了纪律性，使我们的军队具有高度战斗力。在军民关系方面，实行了军民团结的原则，实行了军队不单是战斗队，而且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保护群众利益的工作队的原则，因而它同群众建立了鱼水的联系，它既发动了群众，又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它不但是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的一支强大的战斗大军，而且是以毛泽东思想高度武装起来和以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培植起来的一支政治大军。

联系群众，为人民事业忠贞不屈高度负责的作风，对于我们党的内部生活，必然地发生经常地深刻地影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我们的中央为模范，善于分析和掌握革命实际的具体生动的情况，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来决定和审查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并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教育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因而在每一次每一步的运动中，都具有广大的群众性，运动的每一步都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都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巩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我们党还善于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反映来检查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的立场观点和工作作风，从而易于发现成绩和发扬成绩，发现缺点和纠正缺点；从而易于发现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迅速地加以克服；从而易于发现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并加以清洗。生动活泼的群众革命行动，抚育了我们的党，不断地给党灌输新的血液，教育了我们的党员，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加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巩固革命胜利，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扫荡封建主义的残渣的一系列的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集中表现于抗美援朝^[2]、土地改革^[3]和镇压反革命^[4]这三大运动上面。这些运动的规模之大，收效之快，对于人民思想影响之深刻，为空前所未有。这些运动的结果，必将给我们的国家奠定稳如泰山的基础，将给国家工业化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将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中增强巨大的力量。这些运动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绩，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所订的方针，完全符合于人民的要求，同样是由于我们的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体会，贯彻和发挥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密

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人民群众是那样的热情，他们以最高信赖的心情来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每一个任务；他们响应关于抗美援朝的每一个号召，他们在政府法令的范围内自动地没收和分配土地；他们自动地检举和捕捉反革命分子，参加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审判；他们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高度的劳动热忱；他们把毛主席当作他们的救星，撕下了神像，挂上了毛主席像，所有这些，都是同人民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信仰分不开的，也是同党在当前运动中的正确的方针和正确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分不开的。

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万事大吉，一切都是好的，相反，我们党还存在着不少重大的弱点。作为整体来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度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英明的正确的。但是我们从地方组织来说，我们常常要犯一些错误，我们常常要在中央的帮助下，才能纠正错误而继续前进。如果拿党的组织成员来说，我们就还存在着更大的弱点，我们有大量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成分的党员，有大量的新党员，他们具有革命的热情，但不懂得革命理论和方法，他们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一知半解或者不知不解。甚至有少数党员品质恶劣，缺乏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感情，他们的行动不但脱离了群众，而且损害了党的威信。就是我们一些党龄较长的党员，也还缺乏理论的修养，不少同志只有丰富的但是零碎的斗争经验，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把这些经验巩固起来。因而他们难免有时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时又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时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有时又犯尾巴主义的错误；有时能够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得很好，有时又脱离群众把工作做得很糟。我们还有一些同志在胜利面前骄傲起来，自以为经验很多，遇事

不考察实际，不同群众商量，坐在上面发号施令，因而犯错误，碰钉子。

克服这些弱点，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的水平，纯净党的组织，这是我党中央一贯的指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不断的工作，但因为这是一件比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封建势力更为艰巨的、对于保障革命前进更为根本的工作，需要我们全党不疲倦的努力。

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胜利，只不过是中國革命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不能因胜而骄，而应谨守着毛泽东的教导，保持我党的光荣传统，紧密地联系群众，引导群众走向更大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我们的党将永远同中国人民一道前进，不断地战胜内外敌人的阴谋诡计，建设我们的国家，一直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1年7月1日刊印

注 释

〔1〕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见本书第172页注〔3〕。

〔2〕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3〕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4〕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灾区工作应以战胜灾荒为中心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

各地并报中央：

川北区党委七月六日关于战胜当前严重的旱灾的指示^{〔1〕}是非常重要的。据我们了解，最近各区都有严重的旱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凡属灾区就应以战胜灾荒为中心，其他工作均应服从于这个中心并结合这个中心去进行。甚至可以暂时停止其他工作如土改^{〔2〕}等，专力进行对灾害作斗争。

西南局

七月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关于战胜当前严重的旱灾的指示 指1951年7月6日中共川北区委发出的《对于天旱不雨的工作指示》。《指示》说，6月以来陆续得知二十九个县天旱不雨，区委即连续发出命令、指示并派出检查组要各地认真领导与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旱保苗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个别地区瞒报灾情，因此各地要严重警惕，除要求各地立即严格检查旱象的真实情况外，特别决定：一切旱区必须发动领导群众，抗旱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广泛向群众宣传解释天旱的科学道理，克服落后群众中的迷信与听天由命的心理；和群众一道立即研究出具体办法，等等。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土改、镇反工作 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

根据川东合川及重庆市属巴县^[1]的了解，和看到各地的报告，我们认为有下列现象值得注意：

合川、巴县的工作基础均属中等县，这两县正在进行土改^[2]，在土改中发觉过去对农村基层组织估计过高，实际上还有不少乡村农会和人民武装自卫队掌握在坏分子手上。有不少是名为中农当权实为地主掌握，有不少是名为贫雇农实为流氓分子、一贯道^[3]分子乃至国民党分子掌握，而这些又无例外地为地主所实际掌握，贫雇农在大多数乡村并未居于领导地位。

地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仍很厉害，且较过去为巧妙，放毒、放火、暗杀积极分子等类事件不断发生，更严重的是地主反动派用了各种方法，如收买积极分子、派走狗打入等，掌握农会和民兵。近来反动派正在利用我们少杀人、镇反^[4]宣传不够的机会，散布流言，打击群众情绪，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攻。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给各省市区党委并报中共中央及公安部的电报节选。

有些干部对于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的精神并未真正体会，有的对反革命分子过于束手束脚，有的还是消极抵抗的情绪，对反革命的现行活动也不积极处理，对现行犯不加逮捕，因而更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在清理现押人犯中已发现轻易释放的草率现象，这必然要严重地打击群众的情绪。有些县的领导干部把土改和清案两件不可分割的事情分割开来，只管土改不管清案，或认为清案只有宽大没有镇压。由于这些同志没有亲自参加清案，他们就不会懂得镇反工作中简单粗糙的危险性，就不会懂全国公安会议的正确方针，也就不会在镇反问题上树立正确的观点，改正那些或左或右的观点。

此外，不少干部仍然发展着命令主义，不少干部还不懂得分化地主营垒，集中力量打击最坏部分这个策略的重要性。有些同志只想早日完成分田任务，而忽略了土改的目的性。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很担心现在进行的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土改区工作，我们最怕弄得半生不熟，以至将来难于处理乃至重新做过。因此除请你们密切注意运动的发展外，特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清案必须与土改相结合，清案的重点首先放在土改区，使镇反工作能够直接推动土改，既能分化敌人营垒，减弱其抵抗力量，又能坚决打击其顽固部分，制止地主阶级的任何反攻。

在土改区，对于反革命分子必须依照中央精神，该捕的捕，该杀的杀，该判徒刑的判徒刑，该放的放，该管的管。我们反对的是简单粗糙、乱捕乱杀，但同时必须防止对反革命活动熟视无睹的倾向。特别是对反革命现行犯不及时镇压是很危险的。在镇反问题上，目前主要是在清理案件中使干部既认识我们镇反的伟大成绩，又认识简单粗糙控制不严的危险性，以达到教育提高干部和贯彻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目的。过去捕人

有些乱，所以一般地要暂停捕人。但这不是说现行犯也不捕，应该杀和必要杀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也不杀。更不能误解现在是只讲宽大不讲镇压。在清案中草率放人，打击群众情绪，是错误的、危险的。

第二期土改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宁肯做得少一些，不可使之粗糙。川东合川经验证明，每个乡多做十天左右即可比较完善，对树立贫雇农的领导也较充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合川 今重庆市合川市。巴县 今重庆市巴南区。

〔2〕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一贯道 见本书第325页注〔4〕。

〔4〕镇反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土改斗争要有方法有策略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

川东区党委并转合川县委：

程子健^[1]、廖井丹^[2]两同志从合川回来，反映了合川四区的一些片断的情况。据他们说该区的土改^[3]一般是好的，但我们认为有两种现象值得严重注意：（一）该区地主应赔罚数为八千余石，而已赔罚数只两千余石；地主衣服穿得很坏，但并未低头，甚至认为“政策改了，政府对地主开明了，不要紧了”，表面上承认赔罚，实际上装穷，顽抗不缴。这是一方面。（二）据说区党委派去的某同志宣布：“干部打人干部负责，干部暗示打人干部负责，群众打人干部负责”。这已经变成运动中的法律，结果群众的义愤也在制止之列。这自然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自然不易掀起群众革命的声势，使地主依理服法，不敢胡作乱为，不敢抵抗。这是另一方面。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即使那里分配了土地，也不能认为运动是成功的。必须使同志们了解：土改运动的目的不只是分配土地，更重要的是在树立贫雇农领导、兼顾团结中农的基础上，巩固起人民民主、在乡村亦即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和反动分子的专政力量，不准他们乱动乱说，不准他们进行任何反攻。我们之所以反对和平土改，就是因为它即使真正分了田，也没有打垮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主阶级还有力量进行各种各式的反攻。他们在土改过程中小心谨慎，但他们在我们得力

干部离开之后就会寻机反攻，包括分化收买农民干部，制造农民内部纠纷，打入农会篡夺领导权等等方式在内。所以，凡属和平土改的地方，将来势必要重新做过，那时的麻烦更多。要告诫所有领导土改的同志们，千万不要迷恋于运动在形式上似乎还顺利，似乎很合政策，似乎很正常。必须明确，如果这个运动地主威风没有打坍，农民没有真正起来自觉自愿地行动，而只是听任干部的摆布，那这个运动不仅不是什么合乎政策，或所谓正常，相反地，它正是违背了运动的目的性，因而也就是不合乎政策，不正常的。

我们这封信的意思，不是提倡打人，打人是坏的，干部打人是错误的，农民打人也应该加以劝说。我们之所以这样说，不是为了可怜地主，他们是罪有应得的，而是说乱打乱吊会形成僵局，对农民不利。一切着眼于对农民是否有利，这就是在运动中处理各种问题和规定策略方法的立场和出发点。如果认为农民在气愤之下打了一下地主也是一种错误，或者人为地强制农民不要发泄自己的积愤（当然这时劝说还是必要的），不去扶持群众的革命热情，而去机械地抑制群众的革命热情，这显然是错误的。

不准乱打乱吊乱捉，就必须有另外的方法去对付地主阶级，要懂得这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斗争中要有方法有策略。每个好的方法与策略，都必须是既能够团结自己又能打倒敌人。我们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或尾巴主义，就是因为它既不能发动、团结和教育群众，又不能分化敌人、孤立敌人、从而顺利地战胜敌人。我们所谓讲理讲法的斗争，是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内容来提出的，不能误解为这是照顾地主阶级，更不能模糊了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人民法庭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运用好了就使群众觉得有冤可伸，打人的事

自然就少了。但必须认识人民法庭是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不是什么阶级调和的工具，它不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进行调解，而是要站在农民方面压制地主阶级，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为非作歹。它不能长地主的志气，而必须是灭地主的威风。

重复地说，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问题的本质。那些认为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不明显，不需要激烈斗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或者竟是地主阶级的观点。

我们对合川具体情况不很了解，也许所说的不尽合乎事实。但是我们很担心西南正在进行的两千五百万人的土改，由于群众发动不够，地主阶级打得不彻底，结果出现一批和平土改的地区，弄得将来重新做过。所以这封信即使某些内容有所出入，也是有意义的。

顺致

敬礼！

西南局

七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程子健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

〔2〕廖井丹 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

〔3〕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为西南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邓小平

根据重庆市博物馆保存的手迹照
片刊印

新形势下的军队干部工作^{*}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干部工作很重要，照斯大林的话来说，干部决定一切。所以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首先，讲讲现在条件下的干部工作。现在的条件和过去基本上一样，但有新的因素。决定战争的基本因素和过去一样没有变。打国民党也好，打美帝国主义也好，决定于战争的正义性，决定于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还决定于我们军队本身的素质。军队在政治基础上，才能锻炼出更高的技术。技术包括各个方面，主要的是军事技术。全世界人民斗争的对象是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也不例外。经过朝鲜战争^[1]，我们算摸清楚了这个敌人。从政治上、战略上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能够战胜的；但从战术上说，美帝国主义军队强于其他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美军在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中是一张王牌，我们解放军的一切准备是为了对付这个敌人。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当然，我们有的军一开始就碰伤了，但第一次碰伤关系不大，第二次就打好了。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摸清了敌人。

过去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有两种错误看法，一种不相信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朝鲜战争打破了这一观念。美帝国主义将军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区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队四分之三的主力^[2]用到朝鲜，空军、海军、步兵火器很强，结果美军失败了。在朝鲜这样小的地方出现了美帝国主义军队的主力，而我们的主力根本没动，这说明美帝国主义的脆弱性。这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两大势力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绝大部分人认识到我们是胜利了。人民中间恐美崇美思想过去很严重，经过朝鲜战争这些思想被扫除了。另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对敌人看不起。我们的部队开始所以吃亏就是这个原因，思想上准备不够，对敌人战术上强估计不足。对敌人在战术上要当真老虎打，要这样做准备，要把它看成是个强的军队。但在战略上决定了美帝国主义是要失败的。这两个观点要澄清，不能混淆。我们前方和后方必须这样去认识，第一条美帝国主义可以战胜，第二条战胜美帝国主义还得费力，这两方面都要认清，军队一切要围绕这两方面进行工作。与过去我们面对的敌人相比，现在条件已不同。今天敌人的空军、海军比日本强大得多，就是陆军火器也不知比日本强大多少，与国民党的军队相比，当然更不同。我们所有干部要懂得美帝国主义在战略上是个纸老虎，一定能打败，但在战术上要把它当作真老虎打，要费力。

根据今天形势要求，干部工作主要有四个字，就是“量大质高”。朝鲜战争的人员伤亡与地形有关系。战场太窄使得人员伤亡较大，但人员伤亡不仅是我们，敌人也一样，像沃克^[3]这样的人也被打死了。如果战场宽些对我们要便宜一些。在朝鲜战争中，干部的伤亡，其中师团两级比解放战争时期较大，营连干部的伤亡也不小。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勇敢，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干部的素质不够高。我们的干部条条太少，缺乏理论，包括军事理论在内，往往吃了亏才得到教训。如果我们的干部有了理论，吃亏就会小，胜利将会更大。形势要求我们

的干部量要大，质要高。经验主义是有害的，因此，要提倡学习军事理论。现在一个师有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你没有理论，就不能指挥。过去我们是用脚板发动，现在是用汽油发动。过去指挥错了还可以向后转，也容易，现在是用坦克，指挥错了，要向后转就不容易。

我们军队要现代化，干部必须提高素质。特别是营以上干部，素质的提高很重要，乱碰不行。数量也要增加，有许多新的工作需要人去做。我们今年向上输送二万七千个干部，现在西南工作要靠原有的五十七万军队，地方外来干部一万二千人，军队转到地方的干部近三万人，所以地方上的主力是军队干部，县以上一千五百个干部主要的是军队干部。没有这样的军队干部，发动群众、减租^{〔4〕}退押^{〔5〕}、土地改革^{〔6〕}以及扩大军队近五十万人，所有支援前线的工作哪能做得好呢？这是军队很大的功绩。将来土改后军队再慢慢地分期抽回一些干部是可以的，但数量也不会很大。有一些干部一下子还抽不回来，主要原因是干部缺额很多。今后军队任务很大，要上送各特种兵干部，补齐缺额，还要供给前线。前线伤亡多少个干部，就要补充多少个干部。我们历来是从战争中生长干部的，但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要由后方供给，因此要求干部的量很大。西南应有十四万个干部，现在只有九万，差五万。军委要调一万五千个干部，前线要一万个干部，这就要新生长七万多个干部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开这个会是要你们回去生长七万个干部。九万个加七万个，十六万个干部要提高，这就是新条件下干部工作的繁重任务。军区党委提出“宁弱勿缺”、“宁缺勿滥”八个字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在不滥的基础上“宁弱勿缺”。所谓不“滥”，是指政治质量要好。

我们军队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五十七万人身上的，更要建

筑在渡江作战^[7]和十八兵团进军西北以前干部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十万个旧军官身上。旧军官中之青年军官，经过改造还可以使用，但基础要放在老干部上，因他们经过考验，有斗争经验，与人民解放军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这就会保障不“滥”。据你们反映，新提拔的干部积极性高，办法少。如果提拔起来，过一年办法就多了，要放手提拔。有的地方反映，有的干部一下提两级。如果需要提升两级，我看也好。但不是所有老的都要提，当然要和德才兼备结合起来。你们提出办好各级学校、教导团、轮训队，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计划我同意，要把数目补齐，准备上送干部支援前线，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因此，现在第一要在不“滥”的基础上大量提升干部，第二要好好教育，提高质量。但光有这两条还不够，一定要加上第三条，即切实管理好干部。军队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容易发生不良现象。对出现的问题不警惕，不加以教育与管理，总有一天要算总账的。纠正了错误，干部得到了提高，就可以继续前进。干部管理还有其他工作，如提升要得当，分配要适合，好的要表扬，要将奖励与惩罚制度结合起来，引导干部前进。我们的干部管理部门就是协助各级党委来掌管干部的，切实管理好干部是党的工作，关系到各个部门，也是所有部门的事，但主要是干部管理部门负责。因此，干部管理部门要将材料供应各个部门，协助党委工作，在党委领导下干部才能管理得好。

所谓爱护干部就是要提高教育干部，这是主要的。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工作能力上、业务上包括军事、政治、后勤等一步步地提高他们，使他们能担负更多的工作，使每个人有向上心，这样他们对学习就有了兴趣，这是积极的方面。另一方面是纠正他们的缺点，甚至开展对个别典型斗争也是提高教育

干部。没有这一方面也不能提高教育干部。还有一方面要解决干部的具体困难。对干部福利必须办的应该积极地去办。有些人对自己的房子很积极，但对别人的事他就不关心，这是思想问题，要从领导者思想上检讨这个问题。干部管理部必须注意干部福利，关心干部切身的困难。在福利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干部的身体健康。现在再穷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干部福利问题要成为干部工作中心之一，在可能条件和制度之内，各级机关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应该休养的人员就让他去休养，使所有干部都感觉军队是个大家庭。当然，爱护干部主要是从业务上、政治上、思想上提高，鼓励干部前进，包括奖励、惩罚两方面，并要同时注意关心干部的具体困难。

干部工作很复杂，过去没有专门机关，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军委规定成立干部管理部这样一个部门。干部管理部是党委的助手，管理干部主要是党委的工作，干部管理部是在党委领导下具体掌管干部工作的部门，如果党委不掌舵，工作就搞不好。各级党委要支持干部管理部。干部管理部要在党委指导下将业务工作管好，作为党委在干部工作上很好的助手。据说做干部管理工作的同志不大愿意做这个工作。干部管理工作很重要，这是个组织工作，其重要性不比其他部门弱，它不是技术问题，是个政治工作，我们所有部门都有政治性质，而且政治性质都很强。干部管理部的同志要钻到老，因为干部工作还没有入门，人事制度没有入门。干部工作是很复杂的事，是挨骂的事。但挨骂不要紧，按原则办事。我们干部工作上的奖惩、升降搞好了，干部风气就要变。这个工作不搞好，干部总没有向上心，干部人事调整很难搞好。如果干部工作做好了，干部职级就能很好解决。现在只能拿职位代表德、才、资，所以军委规定要评级，要把职级分清，但今天经济条

件办不到，人事制度尚无基础，将来总有一天要这样做。档案工作制度要建立起来。

党委要加强对干部管理部的领导，这是党委重要工作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要有两个掌管工作的骨干，配一些经过考验的新知识分子，再配齐一批专门人事工作干部，将来还可从几万受训干部中选出一批人来。干部管理工作一点架子都不搭是不对的，并且要有专人，挂名不行，但不要希望编制中所有人都强，全部配起来就会很好。恐怕一时还不可能，要逐步建立，必须有专职人员和有一两个骨干搭起架子。还必须有各方面的协助，组织部门对干部工作熟悉，可以抽点，宣教部门、司令部都可以抽人来做干部管理工作，党委要解决在这方面的矛盾。掌握干部工作的必须是作风很正派、党性强的人，配角也一定要政治纯洁的人。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朝鲜战争 参见本书第307页注〔5〕。

〔2〕 美国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实际参战的部队，陆军占其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海军占其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空军占其作战部队的五分之一。

〔3〕 沃克 即沃尔顿·沃克，原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于1950年12月23日因车祸身亡。

〔4〕 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5〕 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6〕 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7〕 渡江作战 见本书第72页注〔2〕。

反霸必须贯穿于整个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

云南省委：

最近我们看到省委文件中，对于清反减退^{〔1〕}运动有“以减租退押为主流而结合其他内容进行”的提法。根据其他地区经验，反霸退押包括赔罚，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离的。反霸必须贯穿于整个运动中，才能不但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而且也才能在经济上易于达到退押赔罚的目的。因此我们觉得上述提法是对反霸强调不足，我们对云南具体斗争情况了解很少，以上意见只供你们参考。

西南局

八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清反 即清匪反霸。见本书第30页注〔3〕。减 即减租。见本书第56页注〔8〕。退 即退押。见本书第192页注〔5〕。

西南区清理积案和第二期土改情况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毛主席并中央：

西南七八两月集中力量于第二期土地改革^[1]及清理积案的工作。

一、西南各区现押未结案的犯人共二十七万余人，经过六月至八月中旬的突击，业已清理十六万余人，占原押数百分之六十强。四川各区及贵州有的已经结束，有的九月上半月即可结束，西康^[2]尚余五六千，问题不大。惟云南原押犯人八万余，清理者只两万余，即仅达百分之二十四，该省犯人最多，主观力量不足，故决定由他区抽调几百干部去帮助他们进行此项工作。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后，各地都有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发生抵触，误解为只有宽大没有镇压，认为不杀人了，很难结合起来，无法答复群众要求，所以，对清案不积极。不少土改县区不愿结合清案工作，个别地方发生乱放人的现象。后经各级领导机关严格督促，特别是广泛采取召开各界代表会议^[3]及群众讨论等群众路线的清案方针，就很快地清除了抵触情绪。干部从具体的清案工作中，认识到过去在镇反工作上特别在捕人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混乱粗糙现象，如不及时收缩和清理，而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破坏我们的镇反成绩，因此明白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十分必要和绝对正确。清案工作的另一重大收获是进一步团结和教育了群众，过去对镇反表示怀

疑的人，解除了疑虑，基本群众的觉悟和自信心大为提高。凡是清案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反革命更加孤立，谣言很少。在量刑方面，各界代表及群众的意见与我们内部的意见大致相同，很少差别，而党外人士一般是主张从重判刑的。

二、西南第二期土改，共计二千一百万人口的地区，九月份可以结束。连同第一期统计，西南已有三千四百余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这期土改总的说来，比第一期做得仔细一些。根据川北的估计，好的和较好的乡村约占百分之八十，坏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其他地区尚未总结出来。正因为工作做得比较仔细，运动更加深入，故发现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有：农民自信心仍嫌不足，地主则抵抗顽强，方式多而巧妙，千方百计地分化农民队伍和派人掌握农会和人民武装自卫队。有些农民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分田之后产生了满足和换班的思想，一部分干部自私自利脱离群众，贫雇农生产和生活的困难很多。这些说明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决非在一经土改或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就能巩固，而必须在土改之后，从生产、教育和民主建政三个环节上加强工作，特别是从思想上去进一步地提高农民，从经济上长期去扶持贫雇农，认真地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谨慎地建设农村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问题。

三、西南已有约三千四百万人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同时今后计划经济建设的任务异常繁重，所以我们拟于九月底召开中央局^{〔4〕}第七次会议，集中讨论土改后的农村工作和一九五二年的经济建设两大问题。

四、此外，西南今年农业收成一般不坏。粮食收获大体相当于去年，是一个中上年成。棉花烤烟甘蔗等经济作物收成颇好，都超过了原定的计划。

五、我们在工作中最感困难的是干部问题，主要是领导骨干问题，这是我们本身一时难于解决的。

邓小平

九月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 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2〕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3〕 各界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 10 页注〔6〕。

〔4〕 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 月 23 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精简军队 增产节约*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张李王及陈段刘^[1]：

明年财政非常困难，中央会议^[2]决定实行大规模的精简节约，同时尽可能地增加收入。在此方针下，西南应即着手准备实行下列工作：

一、在明（一九五二）年内减少军队三十万人，即由现有的七十万人减至四十万人。其方法是：（一）大大地缩小机关。大军区最多保持一万至三万人，省级军区除云南外均可缩小至千人以下，军分区缩得很小，省专两级实际上成为政府的军事部。有些军分区名义亦应取消。（二）在完成土改^[3]及社会秩序安定的县，只保持武装百人左右。（三）正规军只保持十三、十四、十八等三个军，人数亦求紧凑。请你们立即本此原则，利用现在的训练会议，讨论出一个可行的方案，等我们回后核定。同时请你们拟出在今年十一月间减少十万人（主要是减少县区武装）的办法，以便节省几月开支。

二、党政系统亦要精简，并开展全面性的增产节约、反浪费的大运动。中央已开始实行，此次政协会议^[4]亦以此为中心。请注意凡属不须办的事不要办，不须急办的事（如军政委员会大礼堂）要缓办，办公、杂支、开会、请客招待等等尽量

* 这是邓小平起草的和贺龙联名的电报。

减少。除高级干部外，一般干部生活水平仍须保持。

三、明年农业税不能增加，工商业税要增收到四万亿^{〔5〕}以上（盐税在外），即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四、明年工业投资可能还要减少。地方工业则要求大量发展。

五、今年节余要全部上缴。某些部门的底财还要借用一些。

六、以上各项请你们预先收集材料，等我们回来研究。但目前不要传播（节约运动可宣传）。我们三五天即由京动身经汉口乘船或飞机回来。

贺 邓

十月十七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张 指张际春，当时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 指李达，当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 指王新亭，当时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陈 指陈希云，当时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段 指段君毅，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刘 指刘岱峰，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中央会议 指1951年10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3〕 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4〕 政协会议 指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的三项中心工作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

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

〔5〕四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抗美援朝已取得胜利^{*}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抗美援朝战争^[1]现在完全证明，如果我们志愿军不到朝鲜去帮助作战，美帝国主义的气焰不知要多大。设想美帝国主义军队摆到鸭绿江来，我们国家的建设也就日夜不安。特别是东北的工业区，就在它们的威胁下，也就很难进行建设。还不说台湾问题。出兵援助朝鲜证明是对的，得到了两个结果：一是我们真正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2]，就可以安稳地搞建设工作；二是把美帝国主义的气焰打下去了，纸老虎戳穿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美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压迫手法就没有那么灵了。从朝鲜作战的本身来讲，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效果，把敌人打回了三八线，现在的战线很少有变动。我们的海空军没有优势，陆军的炮火敌人比我们多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伤亡率是一比一，这效果是很好的。特别在最近，我们采取了防御战，敌人的伤亡就更大。最好的一个战斗，敌人伤亡一个半，我们伤亡一个，更好的战斗，敌人伤亡三个甚至五个，我们伤亡一个。我们打得很英勇，寸土必守。因为伤亡大了，最近美国国内叫得更厉害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是由于前线的英勇战斗，但后方的支援也是很重要的。抗美援朝以来，我们确实出了不少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五十八次集体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米，花了很多钱，这都是靠我们的税收以及各方面的收入和人民为抗美援朝的捐献。战争根据现在的情况有两个前途：一是继续打下去；二是停下来。这不是决定于我们，而是决定于敌人。

在停战谈判过程中，我们很诚恳，但敌人总是想破坏。为什么敌人又不愿谈判完全破裂呢？这就表现美国政策的矛盾，表现美帝国主义在本质上的矛盾，它们又怕战争，又怕和平。帝国主义集团在政治上弱得很，没有章法，如麦克阿瑟^[3]和国务院的意见就不一致，李奇微^[4]也是如此。最初他们把谈判的门关了，后来又纠正过来，不关死，矛盾很多，这是心理上的脆弱。在这种矛盾下，战争就有继续打的可能，又有停的可能。美国现在总是扭扭捏捏。我们历来是赞成和平的，我们志愿军出兵就是因为美帝国主义过了三八线。美国现在几次想挽回一点面子，说要在原线停战，实际上面子很早就丢了。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以及世界的舆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的面子丢了，胜利已是我们的了。

从朝鲜停战谈判以来，我们就采取防御，战线基本上没有动。有时候敌人广播说前进多少公里，那是吹的，就是动一些也不过是三五公里。平时我们从山头上远望，可以看到十几公里，三五公里的进退是很微小的。继续打下去美国虽无好结果，但也有可能继续打。我们历来发布的宣言以及声明都是要停战，破坏停战的是敌人。我们也不怕打，如果美国要破坏停战，毛主席说，美国是要失败的，我们不会失败。抗美援朝总的说来情况很好，由于全国人民的支持，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注 释

〔1〕抗美援朝战争 见本书第 307 页注〔5〕。

〔2〕三八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苏美两国商定以朝鲜国土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这条线通称“三八线”。

〔3〕麦克阿瑟 1950 年 6 月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由于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与杜鲁门总统有分歧，1951 年 4 月被撤职。

〔4〕李奇微 当时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

爱国增产 厉行节约^{*}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目前，我们的各项工作在困难情形下都有发展。工业稳步发展，农业普遍收成较好；今年的收支基本平衡，市场物价稳定，物价指数上涨很少，人民生活很平稳，一切都是新的气象。但是，新中国建立两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大量开支，特别是抗美援朝^[1]的需要更大，因此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财政困难。抗美援朝仍在继续，今天我们不能着眼于停，要着眼于打，能够停下来当然更好。毛主席经常说：一切从困难着眼。明年国家是有困难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好，物价就可能波动。所以，今天各方面虽然有困难，大家要想法不使物价有波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大灾荒，吃的树根、青草、野菜有三百多种。解放战争期间，陕北缺乏粮食就杀马吃，仗还是打胜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也不让物价波动，也要使收支平衡。实际上我们只要注意了整个收入，注意了节约，主要是节约，也不至于要杀马吃，也不至于使生活水准降低。现在我们还想维持教育工作者以及机关干部原来实际的收入。当然思想上要有准备，在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忍耐一下。最近在北京与工商界观礼代表见了面，他们觉得似乎西南的税收重了一点，我给他们讲了一个道理：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主要是漏税现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五十八次集体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象多。如果真正按照查账稽征，至少要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收入。把税收工作做好了就会增加收入。希望企业方面能赚一些钱，农业方面增加产量。要靠增产来增加收入。

目前我们有的开支非常浩大，而应该收的没有收够，特别是浪费现象很严重。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坏的一面。铺张浪费的现象在慢慢发展，刚解放的时候要好些，后来越来越铺张，请客多了，人员也不节约了，办公杂费的浪费很多，在建设中的浪费更是严重。最近我们发现革大^[2]修建校址，没有设计好、没有勘察就动工，结果打下去地基都是水，不能造房子，造成了严重浪费。现在有的地方造的一幢房子的价钱，实际上可以造三幢，至少可以造两幢，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还有一些不急需办的也办了，这也是浪费。还有，无论开一个什么会，总要客客气气，富丽堂皇，这些项目合起来的浪费就不少。有人说，假如我们每一辆汽车一个月节省三分之一的汽油，在全国来说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而且完全可以做到。这说明我们的缺点表现在浪费，这是一个新兴国家很不健康的现象。

今天我们面临的困难虽然很多，但是抗美援朝无论如何要争取胜利，不管是打下去或者是停下来。同时，要使国家物价稳定，生产能够发展，首先是工业能够发展。要能够自己造飞机，造汽车，造拖拉机，纱厂要多织些布出来，糖要够吃，盐要够吃。工业逐步发展后支持农业，从农业增产中积累资金，反过来建设工业，其关键在于我们增产节约。毛主席说：爱国增产，厉行节约，就能保障前线的胜利和后方的建设。中财委^[3]陈云主任也要求增产节约，稳定物价。增加收入，税率不能变更，问题是把工作做好，不多收也不少收。今年全国农业税稽征比去年增加了，但真正的增加收入不全是靠税收，更

重要的是工业方面要努力，比如贸易方面，力求运转快一些，这就要国家工厂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来解决问题。要采取各种方法节约，每个单位都要考虑节约，包括人力、物力两方面。一个人每年总要几千斤米，节约一个人就节约几千斤米。在全国来说闲人是多了，当然有些还是不能不养的，有些还不完全是浪费。首先军队要减少一些人，但不等于减少战斗力。各个地方政府、党以及群众团体机构，也可以减人。这两年来总是在加人，当然，一方面是业务发展需要，但是，另一方面要考虑是否需要这么多人。要实事求是，真正要多少人就用多少人，主要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问题。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是节约。过去有些开支是过分的，可以简单些，要防止铺张。这样全国就可节约很多钱，而且节约下来的都是现金。一天天积累资金，推进工业，就可使国家富裕，人民的生活也就可以一天天好起来。所以今天我们一点一滴地积累资金，搞工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欣欣向荣，这才有远大的前途。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2〕革大 即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0年5月14日在重庆成立。先后在成都、川北、川南、西康、云南、贵阳成立分校。1953年10月停办。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对西藏军区人选及机构的意见^{*}

（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中央军委，并告西藏工委^[1]及经武^[2]同志：

西藏工委十月三十日十八时电^[3]悉（该电已直发中央）。我们意见如下：

（一）西藏军区名义以早日公布为好，但须先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好，确定了副司令人选之后，才能公布。

（二）我们同意以拉鲁^[4]为副司令，但还须与地方当局商定后才能确定。我们可先向他们征询意见，请他们提出人选（一两人），然后呈报中央考虑确定。如选中拉鲁时，对阿沛^[5]必须解释清楚，暗示他在政治上多负些责任。

（三）军区机构不宜庞大，以短小精干为原则，不要从内部干部多少去考虑编制，不要因人设事，干部多了可以分做地方工作及分到下面领导生产。西藏军区既系新建，尤应注意及此。至于藏方军事人员，必须妥善处理。可研究各种形式予以安置，他们对于部处等类名义似不一定讲究。

（四）以上意见请中央军委考虑复示。

西南局及军区

十月三十一日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起草的电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西藏工委 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1950年1月24日成立。张国华任书记。

〔2〕经武 即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3〕指1951年10月30日18时，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给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并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关于西藏军区由地方政府选一人担任副司令的人选与军区以下的组织问题，经我们与张经武依据西藏各方情况研究，必须先成立军区以便处理警备交通补给等事宜，谨提出以下意见请速指示，以便与西藏地方政府交谈。（一）军区副司令员可由拉鲁与阿沛出一人担任。为稳定西藏地方政府及争取分化西藏地方政府内部之亲英分子，我们考虑以拉鲁任军区副司令员较合适。（二）军区司令部下设各处，政治部下设各部，以下设科。其理由如下：（1）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情况，四品以上官员较多，如此组织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吸收他们到机关中工作，进行争取教育。（2）根据我军现有内部干部组织情况，如此组织亦较适合。

〔4〕拉鲁 即拉鲁·次旺多吉，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行政官职名。

〔5〕阿沛 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昌都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任。

一九五二年的工作任务^{*}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

一九五二年的工作任务，仍是极其繁重的。朝鲜战争^{〔1〕}还没有停止，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财政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从精简节约中来保证物价稳定的责任。一九五三年即将开始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我们要同全国各地一道，完成各项准备工作。敌人的破坏将变本加厉。

因此，明年须完成下列工作任务：

一、精简节约，严禁浪费。这是保障朝鲜战争胜利的方针；这是积累资本，加速国家工业化的方针；这是树立国家和人民的良好风气的方针；这是当前稳定物价的可靠保证。而现在浪费现象则是全面的，极其严重的，还有严重的贪污问题。

实行这个方针的办法是：（一）节约兵力，减少开支；（二）精简机关，减少人员；（三）缩紧开支，清查资财；（四）提倡节约，严禁浪费；（五）组训民兵，准备征兵。

在群众中号召进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领导这个运动，每个部门和单位都要订出计划，贯彻执行。

二、土改^{〔2〕}及土改后的农村工作。土改按原订计划执行，即在明年春耕前，四川、西康^{〔3〕}两省，贵州大部，云南五十五个县（占人口半数以上）基本完成，其余在年底以前完成。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

完成土改必须包括分山完毕。土地证以在复查之后颁发为宜。土改完成之后，应无例外地实行一次复查运动。复查运动的内容包括下列各项：1. 处理遗留问题，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对于大约百分之二十工作不好的乡村实行补课；2. 评好产量，打下农业税的巩固基础，并刺激农民积极增产；3. 颁发土地证。复查工作不宜拖得太长，一个乡以不超过二十天为宜。

土改后的农村工作，应转入生产、教育和民主建政。同时注意建党。

（一）关于建政。

1. 为了便于建立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便于培养和提拔干部和便于深入工作，必须划小区乡。兹规定乡以乡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基点，半径一般不超过三十华里，乡的人口少不得少于五百人，多不得多于一万人，一般以三千人左右为宜。

2. 超过六十万人的县亦可酌情划为两个或三个县。

3. 区辖乡不得超过十个，县辖区可超过十个。

4. 乡为农村政权的基础单位，乡以下不设村。以乡为单位建立人民代表会议。乡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名额定为二十人（如五百人的乡）到八十人（如一万人的乡）。乡之下按自然条件划为居民小组，人民代表兼组长，代表多的乡，可按自然条件由几个代表选一主任代表。

5. 乡脱离生产人员少可以两人，多不超过六人。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以一百五十斤米为原则，过低则不足以养廉。

6. 重划区乡时，应尽可能以原有场镇为中心，不要把场镇分割给两个以上的区乡去管辖。凡属较重要的场镇，得视需要另设等于乡级或区级之场镇人民政府，直归区或县管辖。

7. 西南在目前情况下，一年内仍以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但该乡场镇其他民主阶层得选代表参加。

8. 省与省、县与县间的毗连地区须做调整者，可由相关省区党委协商调整，尔后呈报备案。

（二）关于生产。

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要求明年按常年产量增产百分之五，至少不低于今年的产量。拟订计划，修筑塘堰，增多水田面积，并防旱灾。提倡饲养家畜，特别是养猪，以解决肥料和增加农民收入。讲求饲养方法，以减少牲畜死亡。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建立合作社，这件事必须积极地进行。动员农民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农业互助组，经过农业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组织，逐步地引导农民走向集体道路。明春进行一次大的植树造林及护林的运动。

（三）今年秋季前完成土改的地区，今冬明春的工作重心应放在：1. 进行复查工作；2. 积极领导生产和合作社、互助组的工作；3. 大量开办农村积极分子训练班，并从训练班中有计划地吸收党员，建立各乡的临时支部。

（四）加强人民武装自卫队的组织和领导。

（五）妇女青年等工作仍由农会领导。在农会领导之下，形成经常的妇女代表会议制度。

（六）认真管制反革命分子，防止地主的反攻。对于那些尚在本地利用封建关系散布反动影响的地主，可以专区为单位，迁移至外县居住，以利管制和改造。

三、省区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五月将领导重点转向城市，主要转向工业，转向各项经济工作；地委、县委则将重点置于乡村，但应分出一部分力量注意城市工作。

有计划地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到工矿企业中去领导民主改革和领导生产。在中央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应大力发扬建设地方工业的积极性，把发扬积极性与防止盲目性结合起来。关于企

业的领导方针，根据中央的历次指示及李富春^[4]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讲话实行。

四、关于财政经济。不可盲目地扩大经济作物的面积，而应以提高产量为主。警惕粮食仍然不足的情况，加强粮食增产的领导。今冬应注意大量增种油菜的工作。明年贸易缺粮数亿斤，将给各地分配任务，动员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明年税收公债^[5]量大，必须加强税务工作，保证完成任务。随时警惕市场情况，保证物价稳定。

五、开始注意学校教育工作。坚决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到大中学校去，首先到中等学校去担任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或政治教员等项职务，领导思想改造运动^[6]，摸清学校情况，以便准备好条件，迎接后年的学校改革运动。调干部的计划由组织部商同宣传部拟定之。

六、遵照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的方针进行镇反^[7]工作。清理中层^[8]的工作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

七、把整党与整风^[9]结合起来，同时可以结合清理中层。于明年五六两月（贵州是六七两月，云南可按自己情况定），即土改完成之后，分批集训所有党员，进行整党和整风。整党的目的在于使每个党员受到八条标准^[10]的教育，同时清洗少数蜕化分子出党。整风的目的是总结工作，布置今后工作和讨论生产、节约问题，形成节约、增产风气。

八、军队将抽调一批干部转入地方工作。土改完成地区，也将有一批干部调整工作。明年工业、教育两项均需质量较高的干部，故各区对干部调配应作通盘考虑，同时以适当数目供给西南级工矿企业及学校之需。

九、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党外人士一道组织《毛泽东选集》学习会或研究会，克服目前干部中正在

滋长的轻视政治的倾向。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72期刊印

注 释

〔1〕 朝鲜战争 参见本书第307页注〔5〕。

〔2〕 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3〕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李富春 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

〔5〕 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

〔6〕 思想改造运动 指1951年至1952年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知识分子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学习《共同纲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7〕 镇反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8〕 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9〕 整风 见本书第143页注〔5〕。

〔10〕 八条标准 见本书第406页注〔19〕。

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各项主要工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九个月来，我们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循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1]决定的工作任务和各种决议，进行了各项工作，都获得了新的成就和胜利。

西藏已和平解放，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一。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西北、西南人民和藏族同胞的支援下，已经胜利地进抵拉萨，并受到以达赖喇嘛^[2]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戴，表现了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胜利。这不但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而且打下了巩固西南边陲国防的基础。

抗美援朝^[3]保家卫国运动，已在西南各地普遍开展。全区广大人民，包括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和各种宗教信仰者，占城市百分之八十和乡村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都参加了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受到了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人参加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人数在四千二百五十余万人以上，签名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4]的有四千五百五十余万人。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各界人民在爱国增产基础上，已认捐飞机二百零九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架、大炮一十九门、高射炮二门，多数地区业已完成而且超过了缴款的任务。全区大中城市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和乡村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口，都订立了爱国公约。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对各项工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阶层人民更加广泛地团结起来，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摧毁了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真正感觉到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光荣。但就运动的情况看来，没有受到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的空白地方仍然不少，有的爱国公约流于形式，这是值得注意的。

土地改革^[5]工作已完成两期。业经完成分配土地的地区，包括一百七十二个县（其中七十一个整县）、八个市，共计四千四百一十二个乡、三千七百余万人。由于土地改革运动是在清匪、反霸^[6]、减租^[7]、退押^[8]、惩治违法地主等一系列斗争基础上展开的，又由于运动中执行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封建的正确路线，所以，运动是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是正常的，加上不断地积累经验，工作一期比一期做得更加踏实仔细，群众发动也更加充分深入。据现在估计，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改革地区，工作尚不够彻底，贫雇农的发动还不够充分，而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方，在一部分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中，正开始萌芽着一种“换班”、“松劲”的思想，因而不法地主得以乘机反攻和阴谋破坏。这些现象，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补救和纠正。

自去冬起，西南全区依靠广大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9]运动，形成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领导有秩序的群众运动高潮。由于运动的开展是在群众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的基础上，由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并参加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以及各级人民政

府和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等机关的努力，目前在全区大部分地区，反革命势力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群众拍手称快，高呼“人民政府有法有天”，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政权也更加巩固了。但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范围和群众发动的程度还不平衡，有一部分地区镇压得不够彻底，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动得不充分，有少数地区和某些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至今还未开始镇压，还有待于今后继续彻底地贯彻镇压反革命的方针。

物价保持继续稳定，工商业和农业有了显著的恢复和部分的发展。部分公私营工业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方针下，工人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的感觉大为提高，生产逐步上升。由于我们大力组织与领导土产推销，组织城乡交流，有计划的加工订货，加上土地改革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目前城市工商业已呈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好转现象。成渝铁路^[10]在全体员工的努力和西南人民的热烈支持下，渝隆（昌）段已经通车营业，今年年底可铺轨至内江。农业生产方面，今年收成较好，加上农民翻身后生产情绪极为高涨，今年粮食产量较去年增加约近百分之二。工业原料作物的产量大都超过去年，棉花已超过战前水平。水利方面，因兴修建塘、堰和小型水利而增加的水田达二百万亩，超过原计划一倍。这些都是我们在工农业方面的若干成就。但在工农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诸如市场扩大与产品不足的困难；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不够，因而难以迎接伟大的爱国增产任务的困难；农业方面的肥料困难和贫雇农在土地改革后仍存在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不足的困难等等，都需要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加以妥善地解决。

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结合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人民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又由于文教工作者的努力，在人民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教育，开始了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运动，推动了各界人民爱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在学校教育方面，结束了一些不应有的混乱状况，大大提高了教师学生的积极性。但不可否认，思想改造运动^[11]这项工作，我们远远落后于全国各地，而学校教育，则较文教工作的其他方面进步更慢。克服这种现状，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少数民族工作又有进步。全区已先后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及民族联合政权一百五十多个。参加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数万人，并还在大量培养。此外，在经济、贸易等方面，我们采取了扶助发展的方针，大力收购土产，供应日用品，因而逐渐改善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这样就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热烈响应人民政府的各种号召，西康^[12]藏胞积极支援入藏部队，凉山彝族同胞自动捉拿土匪、特务近千人，都是最好的证明。

以上这些成绩的获得，使全区工作又前进了一步，走上发展轨道。为进一步发扬成绩，使西南工作赶上全国其他地区，以便争取抗美援朝斗争的最后胜利和迎接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的精神，结合西南当前实际情况，着重做好下列各项主要工作：

一、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进行，为了继续坚持这个正义的斗争，我们需要继续加强工作，按照毛主席所说，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

军。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就是争取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的有力保证，就是加速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它不仅可以保证市场的继续平稳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还可以树立与发扬我国人民勤俭朴素艰苦奋斗的传统风气。应该指出，目前我们在生产方面的缺点很多，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检查，订出增产节约计划，大力贯彻执行。

在工矿企业方面，应教育团结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进一步提高设备利用率，加强机械的检修、保养及保安工作，加强技术管理和资金管理，节约资金，节约原料，减少废料，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克服大材小用、优材劣用的现象。在进行基本建设工作时，要严格地根据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勘察、设计和施工，加强工程现场的检查，严格控制和纠正基本建设中的严重浪费现象和贪污行为。一切工矿企业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实行民主管理，充分发挥工人、技术人员与职员的积极性，把部、局、厂矿的计划变成车间小组的群众行动。每个车间或小组都应根据详细检查的结果，订出增产节约的计划。所有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都应提高政治警惕性，防止暗藏特务反动分子进行各种破坏。同时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把责任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农业方面，要求在一九五二年按常年产量增产百分之五，至少不低于今年的水平。为此必须大力提倡修筑塘堰，发展小型水利；提倡植树造林，严密注意防止旱灾；提倡饲养家畜特别是养猪，以增加肥料，禁止宰杀耕牛，改善饲养方法，以减少牲畜死亡；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有重点、有计划地建立合作社，动员农民在现有互助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本着自愿的原则，建立和发展临时的或常年的各种互助组，以收组织起来、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实效。鉴于粮食仍感不足的

情况，各种经济作物的面积不宜盲目地扩大，应该以改良品种，讲求耕作技术，提高每亩产量的方法达到增产的目的。此外，在农村中还应提倡节约备荒，曾经在个别地方发生的大吃大喝现象应加以纠正。

在林业方面，要严格纠正伐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浪费材料现象，把伐木计划和植林护林任务结合起来，防止地主盗卖树木。

在财粮贸易方面，应该加强业务学习，改善与提高经营能力，加速资金周转，减低商品流转费用，克服机构、设置、运输、保管等方面的浪费现象，并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一切税收人员和工商业者，应该更积极地发扬爱国热忱，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

一切机关工作者，应该把增产节约的任务贯彻到每件细小的事情中去，反对铺张浪费、华而不实的作风，克服工作中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紧缩与合并重叠机构，减少不必要人员，为节省国家开支，提高工作效率而努力。

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我西南人民的中心任务。全西南人民必须动员起来，把它作为各厂矿企业、各机关、各界人民订立与修正爱国公约的主要内容，认真贯彻执行。

二、加速完成土地改革。全区第三期土地改革业已开始，依据我们主观能力，应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底以前，全区除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外，全部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四川西康两省全部应争取于明年春耕前基本完成此项任务。分配和处理山林的工作，亦应在明年年底以前同时完成。凡属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应无例外地实行一次复查运动。复查运动内容包括下列各项：（一）处理遗留问题，进一步发动群众，对

于大约百分之二十工作不好的乡村实行补课；（二）评好产量，打下农业税的牢固基础；（三）颁发土地证。经过复查工作，就可使农民在确定土地权和评好了产量的基础上，大大提高生产积极性。在今年秋季前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除应该进行分配处理山林与复查工作之外，还应该积极领导冬季生产，大量开办农村积极分子训练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克服“换班”、“松劲”思想，以防止地主的反攻，并经过这批积极分子，组织全体农民，进行长期的贯彻始终的生产、教育和民主建政这三项基本工作。

三、认真进行工矿企业和行业的民主改革。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服务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旧企业，改变成为人民的适应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需要的新企业，其先决条件即在于实行工矿企业以至行业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基本方针是“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其主要内容则是管理民主化和生产合理化。经过民主改革，一方面要做到充分发动群众，启发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的主人翁感觉，清除一切暗藏在工矿企业和行业中的特务破坏分子和封建把头分子，并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管理，一改工矿企业的面貌；另一方面，在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各种生产管理制度，以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已进行了初步工作，并开始获得一些成绩。经验证明，不论公私企业，凡执行这一方针的，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就大大提高，一切不合理现象就有可能得到纠正，暗藏的破坏分子就逐渐被检举出来，从而改进了组织领导，减少了事故，增加了生产。但必须指出，我们国营的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还仅仅是开始，已开始了的大都也极不彻底。而在私营企业方面，除个别厂矿外，一般还未能认识民主改革的重要性，仍未下定决心认真实行民主改

革。特别是在建筑、搬运、码头、木船等重要行业中，除个别外，都还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以致大大影响国计民生，阻碍公私经济的发展。在这些没有进行改革或改革得极不彻底的公私企业中，工人没有发动或者发动很不够，封建把头与旧的不合理管理制度，仍旧压在工人头上，机构臃肿，冗员充斥，以及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存在。反革命分子活动无从检举，以致事故迭出，造成国家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因此，今后必须以国营工矿企业和重要行业为重点，认真进行民主改革。同时说服和鼓励资方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改革，使国家现有的公私设备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以克服目前生产不足的弱点，并在完成爱国增产和支援人民志愿军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

四、继续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去冬以来，全区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获得了伟大胜利，给反革命分子以严重打击。但在以往的运动中，只是对于那些已经暴露或比较容易发现的敌人打击得比较彻底，而对于那些隐蔽暗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背后组织者，则打击得很不够，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打击。在一般干部和人民中，常常是痛恨那些显露的或蒙受其直接危害的反革命分子，而对于那些隐蔽的实际上危害更重、危险性更大的反革命分子，却往往易于丧失警惕。因此，我们不能以既有成绩为满足，不能因胜而骄，以致丧失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既然懂得敌人一分钟也不会放松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我们就必须在巩固已有胜利和发展胜利的方针下，继续深入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凡一切镇压得不彻底或根本未动的地区和部门，应该配合中心工作，在普遍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彻底加以镇压。凡过去镇压得比较彻底的地方，也应该继续发现那些隐蔽得更深的

特务破坏分子，随时警惕他们采取更巧妙的方式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对于混入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部门的特务反动分子，尤应发动群众，经过缜密的侦察工作，加以发现和惩处。对于现有人犯，应该贯彻劳动改造政策，这是以强迫劳动消灭反革命分子的重要手段，也是彻底改造犯人成为新人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分散交给群众实行管制的一般反革命分子，应该实行行政管制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监督劳动相结合的政策，并视其改悔程度，在一定时期之后分别情形加以处理，或加重其处分，或取消其管制，以鼓励多数勇于改过，成为新人。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则应进行争取和教育工作，不能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分子对待，并使他们明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拥护人民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措施。

五、文化教育工作。最近毛主席在政协会议开幕词中指示我们，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这次政协会议在决议中规定要“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曾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进行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但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成绩，而应认为这仍是我们最弱的环节。例如最近有些学校，在纠正只搞运动忽视学业的倾向后，又滋长着另一种只搞学业轻视政治的倾向，有人认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甚至个别教师劝说学生不要到国营工厂去实习，个别学生认为参加国庆游行也是妨害学习，不愿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这说明旧有学校教育事业是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如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加以改革，是很难适应目前祖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需要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响

应毛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号召，在西南教育界、文化界和各种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肃清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影响，批判各种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确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学方针，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各地小学教师则应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努力改造和提高自己，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各级学校必须继续深入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必须普遍开展冬学运动^[13]。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中加强时事政治与增产节约的爱国教育。

六、少数民族工作。我们要坚持谨慎稳重的方针，使民族团结工作前进一步。根据以往经验，通过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4]，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民主区域自治政府，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5]，不但符合共同纲领^[16]中的民族政策，也是发扬民主，团结各民族的关键所在。同时，必须从经济、贸易、文教、卫生等方面予各兄弟民族以扶助。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今后则应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方法，做出更多成绩。为适应以上各项工作的开展，还必须注意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加强各少数民族学院工作，开办短期或临时性的人数多少不等的训练班，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应急需。

以上六项，就是我们今后主要的工作任务，做好这些繁重工作，困难很多。但是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号召下，依靠各兄弟民族、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坚固一致的团结，

必将能使西南各方面的工作获得新的成绩和新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 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 见本书第 339 页注〔1〕。

〔2〕 达赖喇嘛 指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3〕 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 307 页注〔5〕。

〔4〕 五大国和平公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为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发动各国人民参与“缔结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运动，要求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反对战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纷纷响应。1951 年 10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支持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要求的决议》，群众的签名运动再度掀起高潮。

〔5〕 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6〕 清匪、反霸 见本书第 30 页注〔3〕。

〔7〕 减租 见本书第 56 页注〔8〕。

〔8〕 退押 见本书第 192 页注〔5〕。

〔9〕 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 298 页注〔11〕。

〔10〕 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 年 6 月 15 日开始动工，1952 年 7 月 1 日全线通车。

〔11〕 思想改造运动 见本书第 451 页注〔6〕。

〔12〕 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13〕 冬学运动 指冬季农闲时期在农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

〔14〕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见本书第 10 页注〔6〕。

〔15〕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见本书第 205 页注〔12〕。

〔16〕 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 34 页注〔2〕。

关于三个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毛主席并中央：

我们回来后立即召开了三个会议，即：

- 一、十一月六日到九日开了中央局^[1]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 二、十七日到二十日开了军政委员会^[2]第三次会议；
- 三、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

兹分别报告如下：

一、中央局会议有各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方针，并据此拟定了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要点^[3]。这个要点业已专送中央，请予以审查批示。明年春耕前西南全区土改^[4]人口为三千八百万余，与一二两期土改人口相等，故任务均重，不能不全力以赴。因此，我们把整党整风两件事都推迟到明年五六两月去进行了。各省区党委将工作重点转到城市，恐亦须春耕开始后才有可能。大家对城市生产和各种经济工作，已有明确认识，用的精力已较前为多。西南局已决定于十二月下旬召开第三次城工会议，专门讨论厂矿企业及一些重要行业的民主改革问题。关于其他经济工作，均可照中央有关部门的计划执行，明年完成四万亿^[5]工商税收，

^{*}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地参考并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你于11月25日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1952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

估计亦有可能。比较突出的是粮食问题，粮食不足的现象颇为严重，明年供应市场的粮食尚缺约七亿斤，加上准备外调一亿，共缺八亿斤。我们已决定用动员方式说服农民卖八亿斤给国家，能否办到，要看工作情形而定。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的改革问题，已定为后天开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主题。我们已决定尽可能地抽调干部到学校，这是改革学校的关键，在我们没有人到学校前，恐不易获得多大效果。

二、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共开了四天，到会委员六十三人，发言者近四十人，发言内容较过去充实，情绪亦好。我们提出并通过了：（1）增产节约，抗美援朝^{〔6〕}；（2）加速完成土改；（3）工矿企业及行业的民主改革；（4）继续镇压反革命^{〔7〕}；（5）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8〕}；（6）少数民族工作等等，这六项为明年的中心任务。同时在会议上做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两个专题报告。总的说来，这次会开得还好，因为我们组织的发言，着重于报告具体工作，成绩显著，内容生动，故对大家教育意义亦大。

三、军区党代表会议因等军委会议，尚未结束。这次到了各师各军分区以上的负责干部共五百余人，在听了部队精简报告之后，颇有波动，多为原则拥护而具体不通，经过详细讨论之后，已无问题。在讨论节约中，暴露出严重的惊人的浪费（也有贪污）现象，负责者多为大干部，引起到会同志很大不满。两年来，贺总^{〔9〕}病了，我又管得很少，军区领导确实太弱，浪费现象又以军区主要是后勤系统为最严重，下面不满是当然的。因此，我们确定这个会议开长一点，起整风会议的作用。首先对大军区展开检查，得出结论，对错误严重者还须做出组织结论，以正部队的风气，并领导全军开展反贪污浪费的

运动。只有把这次会开好，才能把精简工作做好，否则任其发展，将在整编中出现更多的贪污浪费现象，坏更多的干部。会议开完后，当由军区党委做专门报告。

以上作为我九十两月的综合报告。

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中央局 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11月23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

〔2〕军政委员会 这里指西南军政委员会，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3〕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要点 见本书第447页。

〔4〕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5〕四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6〕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7〕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8〕思想改造运动 见本书第451页注〔6〕。

〔9〕贺总 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

坚决进行“三反”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党中央根据目前国家和党内的情况，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非常切合时宜，这是七届二中全会^[1]方针的具体化。这次会议就是要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把党中央这个决定变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一、胜利情况下的严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来，无论抗美援朝^[2]、土地改革^[3]、镇压反革命^[4]运动，还是财经工作、党务工作或群众工作，都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工作做得不错，但我们往往在胜利面前，特别是在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容易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黑暗的一面和存在的困难。我们要领导人民继续前进，不仅要善于发扬工作中的成绩，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党中央的决定无疑又一次向我们敲了警钟。从党中央最近发出的通报看，贪污浪费现象不是个别的或少数的，而是普遍的。

两年来，我们发现个别贪污事件也作了处理。但总的来说，对这个问题是麻木的。贪污浪费现象不是停止而是继续发展。贪污的方法很多，问题很严重。至于浪费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现在大家看到浪费的严重性了，工业部某厂的政治事故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机关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就造成重大损失，西南各地在建筑工程上的浪费数字也是惊人的。在各种浪费中比较突出的是公私不分，有权决定开支的人往往浪费更大。有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该多享受一点。他们讲“大气”，反对“小气”，说朴素是“小气”，是“农村观点”、“保守主义”。总之，浪费现象是普遍的、严重的，党内外群众对此很不满意。

目前反浪费大家比较重视，但反贪污还不够认真。有些同志说浪费确实严重，但贪污还不很多。这种说法在运动开展后将会被事实驳倒。目前贪污现象发现不多，是因为党组织注意不够，群众未发动起来，贪污分子有意识地打掩护。如果以为目前贪污事件发现得少，说明西南党员水平比别人高，那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是运动还未深入的原故。

贪污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发展，主要原因是：（一）西南留用人员和新成分多，他们未经过很好改造，带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坏思想、坏作风。（二）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和干部。西南军政委员会^[5]直属机关贪污的党员中，科级和处级以上干部有多人，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腐蚀到我们党的骨干。（三）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贪污未加警惕，或者虽然发现了也未认真处理。

二、必须坚决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毛主席号召我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东西，积累资金，加速经济建设，加速国家工业化。这是今天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我们西南人民的中心任务。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侵蚀我们党的毒素，特别是胜利后进入城市，资产阶级思想向我们进攻。早在七届二中全会

时，毛主席就曾警告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6〕。我们过去对毛主席这个警告认识不够。如果现在还不坚决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而让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那么，我们就会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三、三反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首先，因为贪污浪费数量很大，而我们又发现得比较晚，因而它已根深蒂固。我们发现的材料还不多，这是因为还未普遍发动群众，反贪污斗争还未深入。必须指出，贪污分子对我们反贪污的斗争，是必然会用各种方法来抗拒的，例如贪污分子会尽力把周围的人拖下水，然后恐吓他们，不许他们声张。他们还可能用各式各样的口号来蒙蔽别人，并且也可能设法灭迹，如伪造单据和伪造账目等，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动员群众，才能揭发他们的贪污事实。贪污事件也可能牵涉到一些有功劳的、流过汗或流过血的人，但无论如何，原谅他们是不对的。运动开展以后，各个支部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斗争，不能马虎，也不应避重就轻，混过了事。要尽力打破群众思想顾虑，认真为群众撑腰，不要以为做几个报告或者学习几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们必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击败贪污分子的阴谋、抵抗，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打败贪污分子最好的办法。

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还必须注意：（一）首先要广泛而深入地做动员工作，包括对所有机关人员及贪污浪费分子进行教育。同时要学习毛主席在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斯大林《论节约》、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把它们作为思想武器。（二）要普遍号召坦白和检举，领导同志要重视群众反映的一切材料，即使情况有些出入也要重视。（三）要适时宣布我们对贪污分子分别对待的方针：对中小贪污分子及一般浪费行为，采取教育改造，以致纪律处分的办法；对严重者才以法律制裁；坦白者从轻或减轻处分，不坦白被人检举出来者加重处罚；对贪污与公私不分的浪费行为应加以区别。（四）奖励和支持那些艰苦朴素的同志，并依靠他们作运动骨干进行这场斗争。（五）贪污时间一般应从解放后算起，即着重检举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内的贪污事件。（六）党内外一起动员，严重的典型贪污事件，必须在报上公布或组织公审。（七）在这一运动胜利开展的基础上，各单位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树立良好的风气，订出增产节约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每个党员要修订自己的爱国公约，以身作则带动全体。

四、组织与领导。

根据党中央指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必须有领导地进行。西南一级机关已经成立爱国增产节约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同时把主要责任放在所属各部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各单位要成立节约检查小组，并选派那些认识正确、积极负责、不顾情面的同志来担任这项工作。在方法上必须实行相互检查的办法，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检查和几个单位互相进行检查。必须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干部带头，这是搞好这场运动的关键。我们在最近两个月内，务必集中力量搞好这场运动，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我们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为了避免精力分散，我建议把整党工作稍推迟一下。总之，目前我们必须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来进行增产节

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严肃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工作》第77期刊印

注 释

〔1〕 七届二中全会 见本书第29页注〔1〕。

〔2〕 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3〕 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4〕 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5〕 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6〕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任务——八十万人的民主改革与一万五千亿元^[1]的增产节约。

根据二十个产业统计，全西南百人以上的厂矿共有三百五十九个，职工十九万三千四百八十三人。邮电、铁路、交通运输、海员、农林水利和金融六业共约职工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人。搬运、建筑和水上三个重要行业共约职工五十四万三千二百四十九人。以上近八十万人的工矿企业和行业为一九五二年民主改革的主要对象。

此外，全西南（缺川北）约有店员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五人；还有百人以下的工厂作坊一千零二十二个，其中有些重要的如小电厂等，也需要在一九五二年进行改革。对于商店只能择个别重要者试行改革。西南各业有初步组织之职工估计有一百三十余万人，如果一九五二年完成了约八十万职工的主要工矿企业和行业的民主改革，就可以说西南的民主改革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两年来，我们对于厂矿的民主改革做了不少工作，但对过去的成绩不要估计过高。做好了的比重很小，夹生饭很多，没有动的也多。从镇反来看，比较彻底的百分之二十，不彻底的

* 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要点。

百分之十七，未动的百分之三十二。如从改革生产来说就更差了。

今后的任务很大，很复杂，要有领导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好工作。全西南各企业的增产节约任务为三万五千亿元，一九五二年我们还要在工业部系统的国营企业中完成增产节约一万五千亿元的任务。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是交互结合进行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企业改革，以迎接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

二、厂矿企业的民主改革。

段君毅^[2]同志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各城市也多少有了一些经验，我只说下面几点：

（一）一切改革工作必须环绕在生产任务之下去进行。

完成生产计划是国营企业的基本任务。民主改革任务之是否完成，必须包括它是否在运动中打垮了五个方面的敌人^[3]，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劳动热忱，改革了一些阻碍生产的不合理的制度，建立了一些合理的制度，从而完成和超过了生产计划，完成和超过了增产节约计划。初步的生产改革，是包括在民主改革范围之内的。一九五二年必须在国营厂矿中做到段君毅同志报告中第四项中列举的各项工作。

过去各系统各部门之所以不协调，就是对于基本任务认识不清的原故。

（二）一切改革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去进行。

现在党、政、工、团脱离群众的现象是严重的。由于领导上帮助教育不够，积极分子脱离群众也是严重的，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真正危险。群众是包括五方面敌人以外的所有工人、职员，以及所谓落后分子在内的。对于落后分子必须坚持争取教育，反对歧视。而发动落后层正是清除敌人的主要办法，也是搞好生产的重要环节。当然这是很艰苦的工作，也是衡量工作

是否深入，基础是否深厚的工作。对于技术人员和职员，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都应采取团结和教育改造的政策，工业建设离开技术人员是不行的，必须认识到这点。

（三）群众起来之后，要注意防“左”。

运动的每一步都必须紧紧掌握住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打击面要窄，关键在于领导上的控制，逮捕清洗名单必须经过市委或企业党委的审查批准，每一步的方针和口号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及上级的批准。

严格区别责任事故与政治事故，迅速结束责任事故的检查，凡无证据的都可以划入责任事故，并作适当的从宽的处置，以安定多数。对反革命应从政治事故中去发现，但不能与一般事故混淆起来。要清洗或调出一些人，并严格限制于重要部门及有危险性的分子。对被清洗的人，要采取负责态度，妥善安置，不能一推了事。在难于安置时，可用分批清洗的办法，以免造成混乱，陷于被动。对反革命分子家属，要多做工作，给以生活出路。在没收财产时，必须给其家属以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可以帮助其找寻生活道路。总之，要做得入情入理，特别防止逼供。

（四）发动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

要注意交代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才不致迷失方向。

（五）肃清敌人的工作不能拖得太长。

一次运动拖长了不利。在运动之前，要进行充分准备，特别是材料的搜集。群众起来之后，领导上估计对敌斗争差不多了，即应迅速转入内部团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必要的生产制度，组织劳动竞赛，争取完成增产节约任务。

（六）领导抓重点，实行专人专责的办法。

所谓重点，就是先公后私，先大后小，先重要后次要，先典型后一般。关于私营企业的改革，必须同资方一块搞。工会也应争取与促进资方改革。指定专人负责搞到底。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也可以分工负责指导，南充、成都在这方面做得较好。

（七）完成民主改革的厂矿，要防止松懈麻痹。

三、几个重要行业的改革。

应以建筑、搬运、水上三业为重点。由于它们具有很大、很散、很复杂的特点，所以这三个行业极重要，改革工作比厂矿还困难。

（一）明确方针，只打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团结一切反封建力量。

（二）群众受压迫甚深，所以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后，要掌握领导，注意防“左”。

（三）必须解决群众的问题，如就业、福利等，川东办伙食团的经验就很好。

（四）建筑业私营比重很小，关键在于国营企业的改革和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其任务为降低国家基本建设的成本而又能适当改善职工的生活。这项工作以市为单位领导，但应由工业部建筑公司负责逐步地统一规章，交流经验。

（五）搬运业基本上应做到国营，组织公司。在民主改革之后，进行逐步的稳重的制度改革与生产改革。应以改进搬运公司为主，适当的开放自运，但不强调自运。改良搬运工具与安置多余劳动力相结合，不宜太急。各有关部门协同统一步调。

（六）水上业基本上全系私营，应逐渐建立一些国营的木船公司或合作社，以带动改革。领导集中于西南局水上工作委

员会，工作则是分散的。木船仍是主要运输力量，但目前大量减少，已显露危机，必须召集一次专门会议，拟定计划，分配任务，成立企业性的组织，明确制造木船的数目，规定分段联运办法。在这方面应由财委计划投资。交通部和公安部门应分别加强木船管理局及水上管理局的组织，统一计划，分区配备。木船码头工作统一于水上工作委员会与木船工会。按照中央指示建立和加强木船工会与船民工会的工作。

（七）其他行业各地可择其重要者进行改革，如成都棉织业。小的分散的暂不进行改革。

四、增产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一九五二年在全区增产节约三万五千亿元，其中工业部系统包括地方工业，增产节约一万五千亿元，任务是很大的，但是能够完成的，而且可以超过的，万里^{〔4〕}同志的报告说得很清楚。各个厂矿企业在规定自己增产节约任务时，目标不能太低，以略有困难但能争取完成为目标，反对保守主义。增产节约，不单是增加了国家资金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企业的改革。所有企业都必须以全国最好的厂矿为目标，学习他们的经验，争取向他们看齐。西南工业各方面都落后，必须逐渐赶上全国的标准，反对满足于小的成绩。

完成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的任务，在目前就必须抓紧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存在于工矿企业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极端严重，国家的损失极大，而且贪污浪费已成风气，不大张旗鼓反对是不行的。

贪污浪费成风，工作不深入，群众发动不够，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是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在我们队伍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是少的，而所谓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则是严重的。普遍存在问题的是：坐办公室，批

公文，终日忙碌，没有时间或不愿意到车间。不到车间，公文更多，许多小事也办公文解决，公文旅行，问题很久得不到解决，或者问题已经解决，公文还在旅行；忽视群众意见，群众很积极地提意见，提合理化建议，有的几百条，有的千多条，其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关于生产的，而领导上很少用心去研究这些意见，予以采纳或给以解答，于是群众情绪由热变冷了；对于群众的福利不关心或关心不够，各主要厂矿用于福利的钱不少，但往往用得不得当，领导自作主张，福利的事不交给群众和工会去讨论；行政和党的领导者，大都对工会的观念模糊，工会干部能力较弱，于是看不起工会，群众工作不经过工会去做，以致领导与群众脱节，而工会本身也是脱离会员群众的，群众把它叫作“行政的尾巴”；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无论工厂管理或工会工作，都极端缺乏民主；少数领导者忙于事务，有时管大不管小，有时管小不管大，分工不明，抓不到中心，终日头昏眼花，问题还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还有人对于严重的事和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满不在乎。

总之，官僚主义是严重的，必须纠正，才能完成各项任务。工厂管理民主化，工会工作民主化，特别是领导深入车间，是纠正官僚主义的良剂。

五、其他问题。

（一）在国营和公营厂矿中，必须逐渐实行在党委监督或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各地党委应注意选派厂长，或由现在的军事代表、党委书记改任。迟派不如早派。

（二）工厂建党问题，照西南局指示执行。

（三）干部问题，各地党委应注意调剂，而以加强厂矿企业为今后干部工作的重点。但各工矿企业必须在民主改革的基

础上，坚决提拔一些好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各个部门和环节中去。现在许多部门完全由留用职员主持，以致“两头动中间不动”，如果我们提拔大批工人加进这些环节中去，至少可以明了情况，问题就好办多了。

（四）小城市的民主改革，不必普遍地搞，只择其中关系于本地最重要的一行一业去进行。在进行小城市民主改革中，必须以发展经济、促进城乡交流为出发点，紧紧掌握只反封建不反资本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无经验，有待于典型试验，积累经验。各县委必须注意粮食、税务、贸易、银行、合作等财经部门的检查和领导。据了解，这些系统中问题极复杂，贪污浪费现象极严重，各地党委必须警惕，负起责任来。

（五）对于私营商业的联营社，不宜提倡。对于这个问题，中央已有专门指示，即按中央指示执行。有些地方的贸易、税务、银行机关用很大力量去帮助私商联营社，反而忽略对合作社的帮助，这是极错误的。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西南工作》第78期刊印

注 释

〔1〕一万五千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2〕段君毅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

〔3〕五个方面的敌人 指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4〕万里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

扩建机场万勿浪费民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中央军委：

川西现有飞机场十个，原占面积三万亩，据空军系统说军委、政务院的意见要由三万亩扩大到十万亩。这些机场都接近成都，土地极好，如再扩大七万亩，则至少有七万农民需要安置，这在目前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很难下此决心，因此建议西南飞机场除个别十分必要者外，一般暂不扩大，凡两年内不办的，也不要预征土地，即使个别机场必须扩大，也要精细检查，万勿浪费农田。西南各地因修建房屋仓库，征用不少民田，已引起很大不满，很值得我们警惕。如中央军委同意，即请另电司令部重新审定计划。并盼示复。

西南局

十二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应 以庄严朴素为主^{*}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张谭，并经武^{〔1〕}同志：

一月六日电^{〔2〕}悉。成立军区大会应以庄严朴素为主，不宜过事铺张，必要的形式与会餐是应该的，但亦以庄严热烈为主，对僧俗官员的会餐似可改为一次。至于具体的预算，可由你们谨慎审核，先行开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你们这一时期在拉萨等地请客送礼等等，都是很必要很对的，但在今后要注意适当收缩一下，以免造成铺张空气，于内于外都不好。当然一切必须的请客和送礼，还是不要吝惜的。

西南局 西南军区

一月十日

根据《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张 指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谭 指

* 这是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起草的电报。

谭冠三，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经武 即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一月六日电 指 1952 年 1 月 6 日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第十八军政治委员谭冠三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西藏军区成立大会预计在本月 20 日左右召开，花费大洋一万五千元。

各级领导在“三反”中要带头反省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

川西区党委并各省市区委、西南级两直属党委^[1]并报中央：

一月十日报告^[2]阅悉。同意你们所拟今后工作方案，你们以较大单位为中心召开联合的坦白检举大会的方式，值得各地效法。各地经验都证明：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做到首长亲自动手，特别是各级首长带头反省坦白，运动就能迅速展开，而且运动不致失去掌握。最近川东公安厅运动发展极不正常，就是因为该厅领导人自己不干净，平时官僚主义很严重，在运动中采取消极态度，结果群众自动起来，造成混乱状况。现川东区党委已决定将厅长撤职并派阎红彦^[3]同志去领导该厅开展三反运动^[4]。川东公安厅的教训，应引起各地注意，凡属领导人不积极，采取抵抗态度的单位，必须坚决地撤职或停职反省，改派运动的领导者，不可丝毫犹豫。

此外，对于工商界，运动的内容不应只限于反行贿，而应照薄一波同志报告^[5]中所说的五个内容，即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机关内部“三反”斗争大体结束之后，还需继续一两个月，对于三年来资产阶级向我党的进攻，进行一次猛烈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西南局为了统一重庆市的这个斗争，已组织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在两个直属党委、军区后勤部、工业部、贸易部、交通部、建筑公司、

重庆市委、市税务局等与工商界关系密切的单位，各组织一个专门的组，这种专门机关的任务是整理有关工商界的材料进行研究，分门别类的处理，拟出斗争目标，首先给那些大奸商以沉重的打击，不使漏网。现在西南级及重庆市各机关，大的坦白运动在多数单位接近完成，而坦白的材料多属中小贪污性质，超过一千万^[6]者很少，川东坦白人数亦多，超过三百万者很少。事实证明，市级已发现一些大贪污犯，但是不易坦白的，必须在适时处理了中小贪污之后集中力量与工商界“五反”^[7]相结合才能搞出内部的大贪污案件。这个问题请各地特别是那些工商业城市加以注意，同样组织专门机构来进行这个斗争。

西南局

一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西南级两直属党委 指西南局机关党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

〔2〕一月十日报告 指1952年1月10日中共川西区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简要报告了川西区十天来的三反运动情况，总结坦白运动的初步经验是：放手大胆发动群众，会议规模要宏大，威力要大，并于事先进行很好的准备与组织工作；各单位首长有问题的，必须带头减退检讨；要充分发扬民主。电报还提出了川西区今后工作的方案。

〔3〕阎红彦 当时任中共川东区委第一副书记、川东行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4〕三反运动 指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10 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5〕薄一波同志报告 指 1952 年 1 月 9 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北京举行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大会上所作的《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

〔6〕一千万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7〕“五反” 指 1952 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掌握领导完全必要^{*}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

振华^[1]同志：

一月十二日电^[2]悉。你对三反运动^[3]所提意见很好，大体同意，兹提出几点意见。

（一）在运动中掌握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只要一个单位有领导核心，是不会出多大偏差的。凡是出偏差的，其主要原因是该单位的领导者自己不干净，又没有勇气下水首先向群众作沉痛的坦白反省，我们在领导上既没有说服他们带头反省，又没有对那些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及时处理，如撤职、停职反省等，结果群众自发的干。凡有这种偏差的地方，其原因主要来自领导，而不是来自群众。因此在领导上，不要一开始就怕出偏差，不要发生一点不正常现象就惊惶失措，就去规定一些所谓防止偏差的办法，这样做只会阻碍运动的开展。我们不少干部，包括大干部在内，两年来确实受了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严重的，下面历来就有不满。群众一经起来，就会揭露得体无完肤，说话上也难免过火，特别是那些不愿下水的人往往下不了台，这不但不可怕，而正要用这副药来消干部身上的毒，如果在运动中能使每一个人都消消毒，我们就胜利了。

* 这是邓小平给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的电报。

（二）三反运动与土改^{〔4〕}在时间上确有矛盾，两者应以何者为先呢？我以为应以“三反”为先，因为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结束之后，再搞那些零星地方的“三反”，恐怕难于收到效果。我想宁肯推迟一点土改，也不要放弃了“三反”的时机，当然，同时要看各县的具体情况去调整工作时间。这点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请你们考虑一下。

（三）处理办法不宜过早规定，以免不合实际易陷于被动。西南局有些单位已进入处理阶段，我们正作研究，当不断地将经验介绍给各地。在运动中对顽抗者可作临时性的处置，如停职反省等，也可以逮捕人，但暂时不宜宣判，等到各地问题大体弄清楚后规定比较完备的办法，会妥善些。

（四）对运动的步骤应该是先内后外（主要对资产阶级），但应注意做准备，找几个同志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对此西南局已另有电示，不赘。

邓小平

一月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振华 即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2〕 一月十二日电 指1952年1月12日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给邓小平的电报。电报介绍了贵州省三反运动的情况，提出了指导运动的具体意见：（1）指导思想必须明确；（2）强调加强运动领导；（3）民主检查与处理问题不要机械划分阶段；（4）农村坚持只搞七天到半个月的原定计划等。

〔3〕 三反运动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4〕 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小城市也要进行五反运动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云南省委：

一月二十四日电^[1]悉。关于你区应否在各小城市工商界进行五反运动^[2]问题，经过我们反复考虑，认为原则上应在一切大中小城市无例外地开展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质是对资产阶级两三年来对我党疯狂进攻的一个猛烈反击，是迫使资产阶级服服贴贴地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去经营工商业，遵守共同纲领^[3]，不敢再行胡作乱为。此外，这个运动本身还对各民主党派起到思想改造的伟大作用。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资产阶级的进攻不仅在大中城市，而且在小城市也是疯狂的，我们各级干部对此都是警惕不够的。不把资产阶级的丑恶方面，如投机倒把、行贿引诱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等等事实暴露出来，就不可能使我们一些共产党员的头脑清醒过来。同时没有工商界的“五反”，就很难把内部的大贪污犯搞出来。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丧失这个机会，而应聚精会神地进行这个斗争。在斗争中，我们应该对于大多数犯法的工商业者采取从宽处置的政策，从而争取其中的绝大多数组成统一战线，去反对最坏的少数的奸商。只要这样做，只要我们把打击目标缩小到少量最坏的奸商（北京约为一千家，重庆估计亦不过一千家，在一个小城市可能只有几家），就不至于影响到城乡交流和人民生活。

同时我们应该发展一批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去代替那些最坏的奸商，即使某些地方暂时受些影响（很快可以恢复），也不可因噎废食，而不去进行五反运动。至于你们防止可能的混乱，采取稳重的态度，特别在云南主观力量较弱的条件下，是很对的，这似可以用一部分地区先进行，一部分地区不进行，一个地方又采取先内后外等等方法去弥补。以上意见请你们再加考虑。

西南局

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一月二十四日电 指1952年1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电报提出，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各地已逐渐接触到对工商业问题；由于“各地各县工商业数量少且多兼地主，减租退押中已搞得不轻”，为照顾土改后工商业的发展，决定不在各专区各县工商界进行五反运动。

〔2〕五反运动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三反运动的有关政策性解释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贵州省委及各地并中央：

二月十一日电^[1]已照转中央，我们意见是：

（一）贪污期限仍应规定为自解放之日算起，其在解放前后发接管财者，当然应以贪污论处，但对自动彻底坦白而又交出原物的，可以从轻处分和免予刑事处分。至于在解放以前较久之盗窃国家财产事件，一般不加追究，但对某些情节重大者仍应追究论处，这是我们在宣布政策时多次说过的，与中央条例^[2]并不冲突。

（二）对技术人员中之贪污行为必须坚决搞出，在处理时可以分别对待。如对真有本事而又无其他政治问题的从宽处理，可以酌情予以戴罪立功机会；对没有真本事的照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对没有本事又有政治问题的，则从严处理。

（三）对贪污数额，国家法令只能以人民币计算，只能按全国标准计算。在中央条例中对贪污分子的判刑标准，不只是根据贪污数目大小（这是主要的），同时还根据对国家损失大小，政治影响，情节轻重，坦白程度等等，作为量刑的统一标准，在运用上是活动的，所以不必再按各地物价规定统一价格标准。

（四）条例中也不只规定一亿^[3]以上者才判重刑，同时规定一亿以下情节重大者也判重刑，而一亿以上坦白彻底者还可

从轻，主动者还可免刑。所以只要在处理中能区别对待，就可打破抵抗，并鼓励迅速坦白。

以上是我们根据条例精神及中央一些批示所做的解释，是否得当请中央考虑。

西南局

二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二月十一日电 指1952年2月11日中共贵州省委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经过摸底和各单位汇报，贵州各地打老虎计划已大大超过原来预定计划；经验证明，打老虎的关键，在于反对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

〔2〕中央条例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51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征求意见稿，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百三十次政务会议通过，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

〔3〕一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关于处理“三反”、“五反” 新问题的请示^{*}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中央、并陈、薄、李^[1]：

三反五反运动^[2]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工商业已表现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西南第一季度税收应到一万亿^[3]，估计只能达到五、六千亿，好多税局已经垮了。贸易额大大缩小，国营贸易公司除粮食减少不大外，百货只达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只达百分之十五。由于贸易部门工业部门不能加工订货，许多私营工业已无事做，资方不敢正面要求加工订货，就以不发工资或要求公家贷款维持伙食等方式抵抗五反运动（有的则确有困难）。由于各种建筑基本停止，造成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重庆失业人数已达两万三千人。更严重的是由于工商业的停滞，影响到大量的城市贫民的生活，重庆第一区^[4]三分之一的人口，约有两万人陷于无食或缺食的境地，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开始借此兴风作浪，如不迅速设法解

^{*} 1952年3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邓小平并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复电。电报中说：“你们关于处理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所发生的内部与外部的一些新问题的意见，中央完全同意。”“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决，将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甚至影响“五反”的深入。我们研究认为工商业停滞的原因是：一、“五反”正处高潮，重庆已有两万工商户坦白或被检举，无心经营；二、“三反”之后提倡节约，有些东西，如纸烟、纸张、文具及各种消耗品销路减少，事实上必须减产或关掉一些，纸张文具目前非常紧张，将来也不够；三、因为“三反”，国营企业或地方企业计划订不出来，也没有人管这些事，凡属依靠国营公营企业生活的私人工商业都无事做，而国家企业、地方工业及基本建设的计划有的是作不出计划，有的又是因为中央各部没有批下来，以致有些国营工厂如轧钢厂无钱发工资，现只好从银行贷款解决。

据此我们决定了如下紧急措施：一、立即恢复一些房屋修建，因为缺乏设计人员，故决定扩大技术简单的工人宿舍及营房的建筑，重庆市也修整一些路面，这样可把一万三千失业建筑工人安置下去；二、贸易部选择重要行业加工订货，无论如何要垫些资金，对此中贸部也应通盘考虑；三、工业部铁路局也应尽可能的加工订货；四、对所有失业工人包下来加以救济；五、只要我们抓住重点解决建筑工人和私营工业两个问题，就可使市场略为松动，市民生活增加出路，再在“五反”中运用北京经验，迅速处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商户问题，以使经济生活早点恢复正常。西南财委^[5]正根据这些原则拟定具体办法，并分别报告中财委^[6]，有些事情与财经制度可能有点出入，手续也可能不很完备，只要是非做不可的，就要请中财委予以支持。

以上是说的外部问题，其次说说内部问题。“三反”以来，有些机构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已经垮了，加之西南干部中的老骨干很少，所以许多事情都系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

子负责。“三反”之后，估计有一批人不能再用，清洗一批万分必要，但暂时的困难是无人接替这些工作。同时“五反”结束，有些被没收或被赔罚的私人工商业必须派人接管，一般的工作人员可以放手提拔“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充任，但每一部门的骨干是不可少的。这些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从西南来说，我们想到的办法是：一、大量地、大胆地提拔“三反”中的积极分子；二、坚决地紧缩次要部门，节约人员以加强财经部门，惟节约出的人估计也不会多；三、干部主要来源靠军队。我在一月份的综合报告^{〔7〕}中曾请示中央批准由西南军区拨一万干部给地方，此点仍请中央考虑加以批准。

邓小平
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注 释

〔1〕陈 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 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李 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三反五反运动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一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

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4〕重庆第一区 今重庆市渝中区。

〔5〕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6〕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7〕一月份的综合报告 指邓小平在1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关于1951年11月、12月的工作报告。

加强民族团结 改善人民生活^{*}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关于当前民族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出了四个文件^{〔1〕}，我们这次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要传达讨论和认真实行。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的决议，对西南来说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

西南是少数民族种类最多、人数最多的一个区域，各个兄弟民族基本上都团结起来了。今后，根据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决议去做，会取得更多的成绩，会使我们团结得更好，工作做得更好。一切有关的重要问题，王副主席^{〔2〕}都报告过了，大家也讨论过了，所以我没有多少话说，只想谈谈各民族的团结工作。

两年来，西南各民族团结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说基本上团结起来了，但有时候还有不团结现象；各兄弟民族间基本上是互相信赖了，但有时候还不够信赖。其原因多半是由于我们做民族工作的同志工作还做得不够，有时候态度不很好，有时候对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工作政策、方针说明得不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够，有时候显得急躁，所以常常发生一些问题。当然，民族间团结以及互相间的信赖，是要经过长期工作才能办得到的，一两千年来的隔阂，不能设想在一两年内就能完全解决。两年来，我们把大的问题解决了，毛主席是各民族的太阳，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枝节问题还很多。所以，不管汉族也好，兄弟民族也好，特别是我们的负责同志，要时时刻刻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要有意识地解决这些问题。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注意了，各级负责人都注意了，这些问题大体上也可以获得解决。如果不加以注意，那么今后还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现在我们在做团结工作，在座的各位同志，大家都在做团结工作。但是，我们更要懂得还有人在做破坏工作。这是什么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使我们不团结。中国人民的大翻身，这是他们最不满意最不高兴的事，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也是他们最不满意和最不高兴的事。不但今天，将来也是一样。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每时每刻都在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破坏我们的团结，企图达到分裂各民族的目的。民族一旦分裂以后，他们就可以来宰割，就有隙可乘来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中国人民的幸福，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特别是西南民族工作的任务，是要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爱国主义精神。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荣和幸福，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和祖国不可分离的。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在那种情况下，汉族翻不了身，各兄弟民族也同样翻不了身。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

在帝国主义奴役下是得不到幸福的。帝国主义这几个字，本身就包含着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意思，它决不会帮助任何一个民族翻身，决不会帮助任何一个民族得到幸福，否则，就不叫帝国主义了。如果有人还想从美国、英国那里得到幸福，那就错了。如果有人企图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来解放自己，那完全是空想，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祖国人民的大家庭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各民族人民才站得起来。譬如，过去西藏是帝国主义在那里控制，西藏人民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得到解放没有？没有。生活比过去好一点没有？没有。得到幸福没有？没有。又拿云南边境地区来说，有许多地方过去是帝国主义在那里控制，试问多年来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没有。那里人民的生活是不是幸福了呢？也没有。这就说明了帝国主义一切行为的目的，是要分裂和奴役中国各民族，而不是要来解放哪一个民族。分裂目的，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把整个中国的各族人民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无论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一样。而各民族真正的希望是要使中国强盛起来，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使中国强盛起来。今天，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已经胜利了，已经粉碎了帝国主义向我们各民族进行分裂的阴谋，已经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了中国，这就给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创造了条件。

今天的中国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真正为各族人民创造幸福。大家要相信这一点，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有可能得到幸福。如今的中国已不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也不是少数人的国家，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国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所以各民族人民第一要相信，没有大家庭幸福，就没有小家庭幸福，没有大家庭独立，小家庭也不可

能有独立；第二要了解，我们的大家庭不是封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统治，而是人民民主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把各民族人民带到幸福的道路上去。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要拼命破坏我们的团结，破坏我们的独立和幸福，所以，我们要十分警惕。要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领袖，我们一切的希望和幸福，只有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能获得。所以，今后要更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使人人觉得我们国家可爱，这是我们今天要不断努力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要实现这个任务，要使人人觉得我们国家可爱，不是空洞洞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不是只说毛主席好、人民政府领导好将来就会幸福的。人们要问：哪一点幸福？哪一点比过去好？如果我们没有具体事实来答复，人们是不会相信的，或者听了道理相信，一接触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造谣，又会不相信了。因此，要使大家从内心里感到我们国家的可爱，首先要使大家觉得这个国家是自己的。过去蒋介石否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各兄弟民族自然感觉到那不是自己的国家，自然也感到蒋介石统治的国家是不可爱的，过去各兄弟民族英勇地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是自己的，是可爱的？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兄弟民族自己的事由本民族自己来决定，由本民族自己的干部来管理。在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地区，建立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还作出了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只要我们按照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议所订出的几个文件去做，大家就会觉得自己当了家，觉得我们国家可爱。不管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干

部，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凡是工作没有做好的，必须认真贯彻执行这次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决议。如果大家真正起来当了家，谣言来了就会听不入耳；事情办得不好，就检讨一下，办得好就继续加以发扬，那么谣言也就没有了。

各民族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当然高兴，因为上千年来忍受着奴役和歧视，现在自己当家做了主，自然很满意。但如果过去吃不到盐，现在还是吃不到盐；过去穿不上衣，现在还是穿不上衣；过去吃不饱，现在还是吃不饱，这个国家究竟可爱不可爱呢？还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从政治上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而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没有这一点，爱国主义是巩固不起来的。拿一个民族来说，不受欺辱了，这个国家是可爱的；如果拿每个人来说，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还是不觉得可爱。譬如解放前每年只能吃一斤盐，解放后能吃到两斤，甚至三、四斤，大家就会觉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就会觉得前途光明，希望无限。如果过去只能吃两斤盐，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实行多年后，还是只能吃两斤盐，那就会问：这个国家有什么可爱呢？所以，我们在民族工作方面，一方面要真正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从政治上去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从经济上去帮助他们，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要十分关心人民生活，要在代表会议上聚精会神地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如何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把它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当然，其他的事情还是要做，如要劝他们不要打冤家^{〔3〕}，要做团结工作。反革命分子要不要捉呢？要捉。譬如，云南边境美蒋特务的武装骚扰，我们要协同人民

解放军去消灭。这些都应该做，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大家的生活搞好。

各级人民政府要注意尽量设法帮助各兄弟民族逐渐改善人民生活，各兄弟民族也要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前几天我和几位藏族同志谈话说，西康^[4]有许多好地方，但那里人民生活很苦，是不是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呢？这是完全可能的。譬如说，西康许多地方出产的萝卜有一两尺长十几斤重，拉萨也一样。这证明那里的土壤很好。如果我们把农具稍微改良一下，地犁得深一些，就可以增加几倍的收获。在康藏地区，一般一口袋种子的耕地，只能收获四五口袋，而人民解放军在那里生产，一口袋种子，就可收到四十几口袋。土地是一样的，只是深耕除草，经营得好一些就可以增加产量。不说产量增加十倍八倍，就是增加一倍，一般也就可以吃得饱，有衣穿，有茶喝了。有的地方纵横几十里很平坦，如果所有负责人，喇嘛寺的负责人、土司^[5]和头人^[6]，大家把思想搞通了，搞一些好的农具去开垦，也就可以增加大量财富。这次天宝^[7]主席从北京买回来一些新式农具就很有用。将来除了种粮食以外，还可以拿一部分土地来种牧草，繁殖牲畜，这样人民生活就会一天天好起来。又如大小凉山的彝族同胞，原来许多都住在山窝里，传说平坝病多，不乐意下山开荒种好田地，把山下好的土地都荒废了，山上土质差，粮食产量少，当然生活就很苦。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工作，告诉他们还是下面好，生病不是有鬼，不是地方不好，只要讲卫生，好好防治就可以减少疾病，话说清楚了，他们也会同意下来的。不然再去一些人民解放军试一试，看那里是否有鬼，是否会死人，这样带头去做，使他们下山耕种，彝族同胞的粮食也就够吃了，生活也会好起来了。

农业发展了，工商业就会慢慢发展起来，经济就会渐渐繁荣起来。大家要多想办法，没有盐吃就想法有盐吃；没有粮食就想法解决粮食问题；生产少就设法使生产增多；疾病多就设法防治。过去总是说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穷，其实是很富庶的。就云南和西康等地来说，都是很富庶的地方，许多国家还不容易找到这样好的地方。主要是要鼓励大家自己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幸福，要靠自己辛勤的劳动生产来争取。各级人民政府当然应该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主要是组织劳动与物质上的交流，以及研究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生产增加，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这样，大家就感觉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里，第一是自己当了家做了主，第二是生活好起来了，国家是可爱的；就会认识到过去是受了帝国主义欺骗，现在我们国家要比帝国主义国家好很多倍。这样一比，道理就明白了，大家热爱祖国的感情也就坚定起来了，各民族的团结就巩固起来了。

过去各兄弟民族领袖人物，在本民族内大家都是相信的，但是大家对他们也有意见，一方面是他们为本民族做了一些好事情，另一方面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现在他们如果带头来做这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大家也就更相信他们了。多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各兄弟民族的领袖人物及积极分子，大家把群众都动员组织起来，人人劳动生产，生活就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的问题就能真正获得解决。

两年来，民族工作仅仅是个开端，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成绩。今天我希望认真地从政治上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希望大家做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认真组织人民劳动，从劳动生产

中使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对劳动中的困难，必须帮助解决，如果放弃这一工作，那就是最严重的官僚主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四个文件 指在1951年12月14日至31日北京举行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所作的《关于民族政策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刘格平所作的《两年来民族工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所作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报告》。

〔2〕王副主席 指王维舟，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3〕打冤家 是解放前四川凉山等地彝族奴隶主为了侵占土地、掠夺奴隶、牲畜和财物，在家支间或家支内部进行的一种械斗。一般带有明显的复仇色彩。

〔4〕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土司 民主改革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分多种等级。

〔6〕头人 民主改革前某些少数民族中部分首领人物的称呼。

〔7〕天宝 又名桑吉悦希，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政府主席。

宣传《婚姻法》 反对封建思想^{*}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

目前在西南来说，所有一切斗争都必须服从反封建。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比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困难得多。所以，单凭我们的热情来一个限期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既要坚决做，又要讲究方法。

我们的错误是不做《婚姻法》^[1]宣传。有些同志心里很急，想一下把事情做好，这是办不到的。问题严重的是我们干部的封建思想还很浓厚，一个革命若干年的干部，往往在思想上对《婚姻法》还认识不够。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以后，接着就转入建政工作，宣传《婚姻法》在建政工作中应是中心内容之一。我们过去不在没有土改^[2]的地区检查《婚姻法》落实情况，而放在已经土改的地区去检查，这是对的。在农村夜校和短期训练班上，加上宣传《婚姻法》和反封建的内容是对的。在各种会议上宣传都是有教育意义的。首先解决干部思想问题，而不是农民封建思想问题。譬如“重男轻女”，就是干部思想问题，这些事干部不过问，谁去管呢？检查一下是一定会收到效果的，但不要检查一下就算了，这就是说，我们还需要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做广泛的群众性教育工作。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上讨论宣传落实《婚姻法》时的讲话要点。

农村土改以后，反封建思想（包括婚姻问题）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土改后第一是树立政治民主作风，第二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封建思想。以宣传《婚姻法》为主题，清算封建思想。如果我们把《婚姻法》作为主题来进行宣传教育，可能得到效果，但不是简单地去抓，而是聚精会神地去做。《婚姻法》要宣传，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中，着重解决的是封建问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反封建思想，再加上宣传《婚姻法》，这样坚持几年以后，我们的农村基础才能巩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婚姻法》 这里指 1950 年 4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5 月 1 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共八章二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2〕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

我们于三月十二日召开了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有各省区负责同志参加，集中研究“三反”^[1]、“五反”^[2]、土改^[3]和经济工作等四个问题。兹分别报告如次：

一、关于“三反”。

西南全区区级以上政府及党群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工厂职员、贸易和银行等业务机关的雇员在内，共约四十五万人，除学校没有全动，一部分厂矿还没有动以外，均无例外地开展了猛烈的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大都是从反对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入门，各层领导干部下水过关。从二月中旬开始，转入捉“老虎”^[4]的运动。从运动全貌看，是广泛的和深入的，到三月底和四月上旬，县以上的三反运动即可先后基本结束，转入打扫战场阶段。据此，会议对“三反”作了如下的布置：

（一）西南四百零一县中，有二百七十九县（四川一百三十九县全部，贵州七十七县，西康^[5]十五县，云南四十八县）

^{*}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节录。中共中央于3月20日将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

平均捉“老虎”数较多，而且正在发现“虎窝”，不宜停止，故决定继续进行，这些县份估计四月上旬大体可以结束。另有六十四个县（云南五十九县，贵州两县、西康三县）原已进行，因捉“虎”不多，或因领导无力，或因灾情严重，故决定立即停止。另有五十八县（云南三十、西康二十八）或系地处边远，或属少数民族区域，原来即未进行，以后再说。

（二）区、乡“三反”一律推迟到县以上“三反”全部结束，或在秋收以后再进行。区、乡“三反”一律采用川西灌县^[6]试行的成功经验，即将区、乡干部集中到县，一面反省坦白，一面在乡村号召群众检举。由县委紧紧掌握，根据坦白、检举结果，规定哪些应该保护过关，哪些应该处分，哪些应该判刑。然后由领导机关派人带他们回乡，召集专门的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不用群众大会形式）帮助他们坦白反省，再作出决议。其须判刑者即另行召集群众大会公审。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既发动群众检举，又防止了“左”的毛病，更可以避免地主阶级乘隙反攻，达到保护大多数问题不大的干部的目的。

（三）学校“三反”必须进行，但不宜无把握地进入战斗，必须领导力量照顾得到，故可推迟一点进行。

（四）凡属打“虎”较多的地区或部门，即应将运动转入核实战果阶段。核实战果的内容为四查一追，即查真假、查大小、查“坐探”^[7]、查政治与追赃。其中关键在于追赃。因为追赃不但可以判明真假、大小，且往往能从赃款用途中发现政治问题，但要严禁主观地、故意地追问政治问题。追赃是极艰苦的斗争，不少同志在这点上表现犹豫，弄得虎头蛇尾，此种倾向必须纠正。但追赃不能硬逼，必须好好动员，讲求方法，使贪污分子觉得退比不退有利。资产阶级的经济“坐探”必

须清查出来，不但在“老虎”中，甚至在小贪污分子中，也埋藏有这种人，有的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分子混入的。例如多数县的工商科长就是我们请进来的，必须查出他们的问题后加以适当的处理。至于政治问题，应移交公安部门另案处理，一般以在“三反”之后去处理较为适当。目前，对这种政治反革命分子仍只按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其经济部分，特别是退赃，但暂不结案，而等到政治问题弄清后再行结案。总之，千万不可把“三反”与“镇反”^[8]混淆起来。

（五）对处理贪污分子的办法，完全遵照中央指示及中央节委条例^[9]执行。

（六）为了逐步抽出力量照顾经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会议决定除少数正在打“虎”高潮的单位外，应立即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搞业务，四月上旬将大部力量转到业务，力求在四月份内使各方面工作完全恢复正常状态。为了节约力量，各单位可采取集中“老虎”进行清理，集中“老虎”对象进行审查的办法。

（七）在三反运动中，各地都有程度不同的逼供行为和肉刑与变相肉刑，因此，可能有一些假“虎”，这是运动中的主要缺点。会议决定坚决纠正逼供和肉刑，坦白交代之后仍然违犯者应受到处分。

二、关于“五反”。

西南因领导力量集中在“三反”，认真进行“五反”的城市不多，做得好的更少，但较普遍的是以“三反”为中心附带地搞了一下“五反”。因为“三反”必然牵涉到工商界，不搞“五反”就难收内外夹攻之效；也因为多数城市是环绕“三反”进行的，故涉及面不大，毛病也不太多。现在的情况是，凡属“三反”深入的地方，不搞“五反”是很难弄清问

题的。同时，无论大、小城市的工商界，特别是那些问题较大的主要行业，都存在等待“五反”过关的情绪，所以不等于停止“五反”就能恢复他们的经营积极性，甚至可能加紧逃避资本，形成混乱。我们估计了这种形势，又估计了主观力量，决定把城市分为四类，分别布置如下：

（一）目前集中力量进行第一批二十五个城市的五反运动，即川东四个、川南五个、川西五个、川北两个、云南两个、贵州三个、西康三个及重庆市。这些城市都是省辖市或地委辖市，或为地委所在地，或为典型试验的县城，一般都已普遍展开，发展一般是正常的。北京市处理办法^{〔10〕}公布后，运动的策略性更加明确，处理更加迅速。这类城市在四月份内都可结束。

（二）必须进行的还有六十一个城镇，即川东十一个、川南十个、川西十一个、川北六个、云南十三个、贵州六个、西康四个。这六十一个城市都是各区的经济重点，不少是地委所在地，力量是来得及的。这批城市目前应集中力量搜集材料，等到第一类二十五个城市运动告一段落，省区党委有力顾及时，即行正式展开。这类城市又采取一般交代、重点突击的方法，即对一般的中、小户放宽一点迅速处理（仍需对每户作出结论发给通知书），而集中解决重点行业和重点户的问题。我们估计有了第一批的经验，事先有了准备，又采用这样的方法，一个城市大约一个月时间可以大体结束，剩下若干难搞的慢慢去搞就行了。这批城市大约四五月间可以先后展开，五六月间可以结束。只要把以上两类共八十六个城市的“五反”搞彻底，就算基本上解决问题了，西南五反运动即告全部结束。

（三）第三类城镇约二百多个，这些都是五百工商户以下

的，牵涉到三反运动中去的也是一些主要行业，所以，我们确定这类城市仍然结合“三反”迅速结束“五反”的方针。估计到主观力量，只采取一般号召、个别突击的方法，即召集工商户及店员群众大会，号召坦白检举，对绝大多数工商户迅速处理，宣布他们过关，而只对个别行业和个别问题严重的工商户给以打击。这实际上是收缩的做法，目的是使工商界认为已经过关了，安定情绪，便于恢复经济常态。同时，这种做法只要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够了，也不至于出乱子。当然，这类城镇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考虑可以放到将来城市民主改革中去补“五反”这一课，目前把他们安定起来是有利的。

（四）第四类是那些工商户不多的城镇，决定一律不搞“五反”，一律在城镇民主改革运动中去解决问题。

（五）“五反”的策略，完全照中央指示及北京市处理办法执行。“五反”的情况以后随时另作报告。

三、土改情况。

西南第三期土改，预定为三千八百万人口的地区，除贵州减少二百二十万人口，云南减少一百四十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外，其余均可于春耕前如期完成。这是由于各地恰当地调剂了土改和“三反”领导力量的原故。第三期土改完成后，全西南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只剩约一千万人口，其中云南七百万、贵州三百万的地区没有完成，这些地方到今冬明春就可搞完。第三期土改一般还好，其困难是山地地广人稀，地主阶级有了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准备，好处是我们的土改经验更多了，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现在土改中的问题是分山问题没能很好解决，复查工作已决定推迟到今冬及明年全年中去进行。此外地主阶级及反革命分子在农村反攻较厉害，各地要求多杀几个人，我们已经同

意，并要他们上报计划。

四、关于经济工作。

这里不谈由于“三反”、“五反”所影响的经济情况以及必须迅速使之恢复正常状态的理由，我们在会议上主要是研究国家各种经济机构如何迅速恢复工作的问题，主要又是干部问题。因为只要国家机构恢复工作，着手收购土产，加工订货，进行可能和必需的基本建设，同时又根据中央政策进行“五反”斗争，是可以迅速改变市场死滞情况的。经济机关“老虎”最多，干部最缺，必须加以解决。我们拟定的办法是：

（一）确定全区调剂干部的重点是以税收、贸易、银行、合作社为主的经济部门和“老虎”较多的公安部门，其他各部门必须尽量节约干部特别是骨干分子。

（二）解决干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大胆地提拔在“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破格地提拔他们负担各级工作。我们的组织形式也应适应当前的干部情况，有所伸缩。例如没有人当处长，可把处变成科或组，选拔先进分子当科长或组长。在干部问题上主要是反对保守主义。

（三）合并一些单位，也可以节约一些干部。

（四）按照中央政策，迅速正确地处理千万元^[11]以下的贪污分子的问题，百万元以下的摘掉贪污帽子，如此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仍可继续工作，同时又在大、中贪污分子中争取一部分（主要是技术人员）戴罪立功或在机关管制下工作，那么，干部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五）中央已批准军队转业干部由我们尽先使用，同时土改结束后可调剂部分干部，这两批干部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此外，关于春耕生产，各地已抽出专员、县长等主要干部并组织专门的办公室负责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与防旱救灾等工

作，不致因“三反”、“五反”而有所放松。但值得忧虑的还是久不下雨，有的地区旱象已成，小春肯定减收，如再不下雨，问题就严重了。我们正密切注意这个问题。

五、总起来说，我们在四月份可以完成“三反”，五六月间可以先后结束“五反”，四月底（贵州是五月，云南是六月）可以大部完成土改。同时我们力争在四月初恢复财经摊子，四月底完全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如此，我们今年的大算是过去了，所以三、四、五月的工作仍是繁难而紧张的。根据现在情况，有些工作不能不推迟一些，如土改复查工作、城市民主改革和学校改革只能推到秋收以后乃至明年去进行。整党和清理中层^{〔12〕}两件事在“三反”基础上较易完成，但接着进行三反运动，建党工作就要受到一些影响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稿刊印

注 释

〔1〕“三反”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2〕“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土改 见本书第10页注〔3〕。

〔4〕“老虎” 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

〔5〕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6〕灌县 今四川省都江堰市。

〔7〕“坐探” 指混进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刺探经济情报的破坏

分子。

〔8〕镇反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9〕中央节委条例 指《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1952年3月8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3月11日公布施行。

〔10〕北京市处理办法 指《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1952年3月8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3月11日公布施行。

〔11〕千万元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12〕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目前加上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应该比过去更重要一些。但是帝国主义细菌武器的效果究竟怎样？当然是要死人的，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要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卫生防疫工作。如果没有细菌战，西南流行的鼠疫和伤寒等也要进行防治；有了细菌战，就更要加强防治工作。总之，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美帝国主义企图造成一种“神经恐慌症”，这样他们就有利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防护，另一方面也不要自己造成恐慌情绪。报纸除注意一般的卫生宣传如刊载一些反细菌战的信息和夏季灭蚊、灭蝇、环境卫生知识等外，其他的用不着宣传。宣传不当也会发生恐慌的。

我们的工作不是消极的防疫，是要积极地做预防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八次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为西南区首届 体育运动大会题词

（一九五二年五月四日）

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

邓小平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
华日报》1952年5月4日发表的
手迹刊印

三反五反运动应 防止“左”的偏向^{*}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

一、西南区“五反”^{〔1〕}自三月份以后，一律按照中共中央历次指示及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的计划进行，特别是上海的经验对各地帮助甚大，故发展尚称正常。据各地报告，川北“五反”已基本结束；川东、川西两区五月中旬亦可全部结束；贵州除贵阳市走了一些弯路须推迟半月外，其余七十三个县市亦可于五月中旬结束；川南原已进行的五个城市五月中旬可以结束，另将有十七个城市于五月十五日开始进行；云南现只在十六个县市（两个第一类、十四个第二类）进行；西康^{〔2〕}的十八个城市五月底可以结束。各省区的综合情况报告均已转报中央。重庆市自四月份得到上海经验后，即开始压缩核减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和违法款的数额。工商界的情绪业已稳定下来。成都市近日即可将违法户处理完毕。昆明市截至五月六日止，只剩少数违法户尚未处理。总起来说，西南“五反”除川南即将开始的十七个城市和云南大部三类城市暂时不搞外，五月底可以争取全部结束。

二、我们的“五反”在三月份以前因指导上忙于“三

^{*} 这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的节录。

反”^[3]，故控制不严，又多系配合“三反”进行，出了一些乱子。在正式进行“五反”的重庆等二十余城市，亦因缺乏经验进展极慢。三月份以后，各地按照西南局指示，严格督促各城市将打击面缩小，明白规定：第一类城市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得超过工商户百分之三，第二类城市不得超过百分之二，第三类城市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现除个别城市打击面仍嫌过大正继续纠正外，一般均已控制在上述比例以下，由此纠正了一些“左”的偏向。工商界也因为摸到了底而情绪日趋稳定，凡是结了案的，大都转向积极经营。我们在“五反”中的最大毛病，是对大工商户的处理拖得太久，对工商业的恢复影响较大。全西南不过五千工商大户，他们在工商业及国计民生中起重要作用，他们结不了案，即使百分之九十几的中小户结了案，也不能使经济生活恢复正常，我们在这点上吃了些亏的。现已通知各地将当地关系经济生活比较重要的大工商户迅速结案，并结合贷款迅速恢复经营。西南财委^[4]亦已通知各地将干菜、山货、药材、油脂等土产行业迅速结案，并准备于六月中旬召开土产交流大会。凡尚未开始“五反”的地方，必须一律采用上海先两头后中间的经验，首先把重点放在大户，从速结案，以免再影响经济和生活。

三、“三反”、“五反”对于经济生活影响很大，主要是由于某些行业的经济改组，产生产销失调、部分停业等情况，这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西南税收第一季度已按我们自己的调整数全部完成；第二季度估计可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主要是重庆税源大减。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户尚未结案，大宗经营尚未恢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济改组的影响。例如重庆机器业、橡胶业、皮革业、针织业等，过去全靠政府、军队加工订货，现在则暂时无工可加、无货可订。又如纸、烟等业因产销失调，

大大减产，甚至国营工厂的纸、煤、洋灰等产品也暂时过剩，因而税源大减。当然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估计六月份以后定会改变。据各省区报告，全年税收任务仍可以保证完成。我们已告各地尽可能设法加工订货，银行放手贷款，使市场活跃起来。至于工人失业情况在西南各地尚不突出，在一、二月时比较严重，三月份以后多数已分散安插下去。不过在劳资关系上有些新的问题，如工人监督生产问题，工人的劳动态度和如何团结鼓励资方积极性问题等。在公私关系上也存在加工订货算得过苛，使资本家获利太少；国营贸易公司降低物价必须计算到私商的合法利润等问题，都须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中央指出“五反”必须以生产为主，同时指出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防止“左”的偏向，都是非常及时和非常重要的。

四、西南“三反”正加紧进行对大贪污分子的追赃结案工作，因追赃问题多涉及工商界，使结案更加复杂和困难。现决定涉及工商界部分并入“五反”处理，当会快些，估计五月内可大部处理完毕，六月份还会有一个大尾巴，好在各项工作均已恢复，少数人拖长一点影响不大。年内不能追回的违法款则推到明年上半年内缴齐，这样做使资本家缓一口气，市场不致死滞，好处是很多的。至于“三反”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如思想上的补课和交代社会关系，即清理中层^[5]等，我们规定省级以上可接着“三反”进行，专区级以下须等到春耕完毕以后进行，以免妨碍生产。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主办的内部
刊物《西南工作》第104期刊印

注 释

〔1〕“五反” 指 1952 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 年撤销。

〔3〕“三反” 指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10 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4〕西南财委 即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 年 8 月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主任。

〔5〕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试行在私营企业中 工人监督生产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

各省区转各省辖市委并报中央：

兹将重庆市委《关于在私营企业中实施工人监督生产的试行意见》^{〔1〕}转发你们参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在大中城市中选择一二点试验，并将经验随时报告。至于各小城市则可一律不搞，免致混乱。

西南局

五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关于在私营企业中实施工人监督生产的试行意见》是1952年5月10日中共重庆市委制订实施的。《意见》提出，在“五反”以后，“为使资本家不再犯“五毒”，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已成为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工人监督的性质是要正确地解决公私关系的问题，前途是走向工业国有化的道路。《意见》还确定了工人监督的职权范围，制订了实行工人监督的步骤与计划，并强调在实施工人监督中必须加强工会工作。

土产业输出问题值得严重注意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财委：

重庆市土产输出业座谈会上的各项反映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如不妥善解决，将大大影响城乡交流和农民生活。各地财委首先是贸易部门，对于土产价格、公私关系、加工利润等问题缜密研究，必要时可分别召集一些座谈会，以求迅速解决。至于退赃问题，中央已有明确规定，必须坚决遵照执行。

西南局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对昆明市“五反” 退赃计划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云南省委并报中央：

五月二十四日转来昆明市“五反”^[1]退赃计划悉。

（一）西南全区“五反”反出的盗窃数为三万亿^[2]，其中昆明占三分之一，仅略次于重庆而多于成都，按罪行的可恶程度来说，昆明要超过重庆、成都。现重庆计划追回四千亿，其中现金二千亿，没收及入股一千五百亿，分期退五百亿。成都为一千三百亿。故昆明退赃数以控制在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亿之间为当。我们拟从全区“五反”中追回一万亿，其中拟分配云南两千亿（主要是昆明，其他地方很少），至少亦应分配一千八百亿，才能同其他省区在政策上表现一致，请据此对昆明计划再行考虑一次，并将意见告知。

.....

（三）“五反”退赃除现金及入股两部分外，应有一部分（中央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分期退的，但以于一九五三年一年内退清为好。昆明市计划中有分两三年退清者，这样太长，资本家背包袱太久，也不适当。

^{*} 此文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四）对于贩毒案可暂不处理。我们考虑因“五反”刚刚结束，需要安定一下，故确定六七两月不搞禁毒运动，推到八月或九月再搞。但应在这两个月内进行充分准备，先搜集材料，拟定打击对象，规定具体办法，即十天半月就能结束的办法，先把控制数目报来西南局核准，而后再行动作（各禁毒重点以同时动作为好）。云南是禁毒运动重点之一，请省委通盘考虑，拟定计划。昆明市对烟犯打击是否够痛，也须研究。

西南局
五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五反” 指 1952 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三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西南是交通第一^{*}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成渝铁路^[1]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热闹一下还是需要的。军政委员会^[2]是重视这件事的，至于具体工作，由庆典筹备委员会去进行布置。

各方面对于工程是很努力的，特别是超额完成计划的很多，由铁路局写一个军政委员会嘉奖令。但是要评好，如果奖励了一部分，得罪了一部分是不好的，要评得公道，如果不公道，还不如不奖励。评好以后发一个嘉奖令，鼓励一下有好处。

西南的铁路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铁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过去我们说过要修天成路^[3]，现在已经开工了，明年争取川黔路^[4]开工，川滇路^[5]也开工，甚至争取滇黔路^[6]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 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三次行政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月 1 日全线通车。

〔2〕军政委员会 这里指西南军政委员会，1950 年 7 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3〕天成路 指甘肃天水到四川成都的铁路。

〔4〕川黔路 指四川重庆到贵州贵阳的铁路。1965 年 10 月 1 日建成通车。

〔5〕川滇路 指四川成都到云南昆明的铁路。1970 年 7 月 1 日建成通车。

〔6〕滇黔路 指云南昆明到贵州贵阳的铁路。1966 年建成通车。

当前的经济工作和三反五反 运动后的建设工作^{*}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二日）

我们近日召开了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有各省、区党委负责同志及财委副主任、商业厅长、银行行长参加。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工作和“三反”^{〔1〕}后的建设工作，并根据西南局第七次会议所确定的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排列下半年的工作日程。会议首先听了刘岱峰^{〔2〕}同志关于中财委^{〔3〕}会议的传达报告并作了讨论。

一、“五反”^{〔4〕}以来，市场的暂时停滞现象是严重的，以二三两月为甚，四月下半月开始恢复，惟进步甚微，五月下半月开始好转，但仍未恢复正常。总的情况是小城市恢复得好，大、中城市则进展迟缓。以重庆为例，六月上旬的交易额只相当于去年十二月平均每旬的百分之六十。恢复得最好的是成都，六月上旬的交易额已达十二月平均每旬的百分之一百零九，但公营比重加大，私营只恢复百分之六七十。税收情况也是小城市好，大、中城市差。所以恢复经济生活的关键在大、中城市，更在于使约五千工商业大户动起来，故须从下面几方

^{*} 这是邓小平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节录。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中央局。

面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一）迅速而正确地结束“五反”。西南进行“五反”的城镇约三百个，都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发展正常，一般符合中央政策，在运动中都曾发生一些偏差，但获得了及时的纠正。这三百个城镇大都业已结束，有些大、中城市还剩有几十户、百余户，或因“三反”牵扯，或因案情复杂尚未结案，只要按照政务院指示执行，也易于处理。故我们决定所有城市一律须于七月上半月内正式宣布结束“五反”，重庆现已宣布基本结束。“五反”、“三反”赃款，各城市可根据情况酌情减免一些。我们觉得对待资产阶级既不能太严，又不能太松，太严会大大影响经济生活，太松则会减弱“五反”的严肃性。所以，处理“五反”问题，包括核定赃款，要不严不松，在税收上面要严，坚决照税章办事。在加工订货、银行放款、营业分配等上面则应松些。

（二）正确调整“五反”后呈现出的新的公私关系，在这方面目前主要是防“左”。在加工订货上，要纠正计算过苛，工缴过低，规格过严的毛病。在银行贷放押汇上，失之太紧，不能配合当前恢复经济生活的任务，这在西南是较普遍的毛病，必须纠正。重庆市长宣布放宽贷放尺度反映很好，但都担心银行不能照办，值得注意。在贸易工作上，中财委规定的公营暂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公私零售额比重在西南是适当的。根据此比例，西南的合作社仍须坚决按照计划发展，但某些行业，如百货等国营比重过大，暂时不宜再行扩大，有些则还须适当缩小，让点市场给私资活动是必要的。最近重庆在联购青麻上规定了合理的公私比重，影响甚佳，刺激了私商的积极性。此外，由于近来全国物价普遍降低，也引起商人的普遍叫喊，感到生意不好做，怕大量进货。因此，确定西南区在一个

相当时间内，除个别必须调整者外，以维持现有牌价为有利。

（三）劳资关系也需调整。在工人中，一方面要充分保护工人的热情，监督资方再施“五毒”^{〔5〕}，并防止资本家的反攻；一方面要用说服的方法，教育工人遵守劳动纪律，团结和鼓励资方积极生产和经营。对于那些不守劳动纪律和限制资方经营积极性的“左”的倾向，应耐烦地加以纠正。工人监督生产，除正在试行的个别厂店必须加强领导积累经验外，试行范围暂不扩大，以利于安定资方情绪。为了解决和稳定新的劳资关系，成都市采取了五个工人以上的工厂、商店普遍订立劳动合同，四人以下厂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的办法，收效极好，各地均应仿行。在“五反”过程中，资方拖欠工资的现象极为普遍，应由资方照数补发，但一次补发确有困难，重庆市采取分期的办法实属必要，这个办法各地可以效法。对于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凡属合理而又可能者应予支持，但必须由市委谨慎掌握严格控制，一般说来，目前是不宜于普遍增资的。

（四）对于城乡内外交流，应鼓励私资积极性，主动打通城乡特别是大区与大区、省与省之间的原有的贸易来往关系，开好土产交流大会，银行贷放也应与交流大会配合起来。

（五）对于当前的经济改组情况，各地党委及财委应好好研究，多想些办法，使波动小一些。西南失业工人现约八万，多因经济改组而失业，以建筑搬运工人为最多。如果我们把已经确定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计划迅速订出并提早施工，就可以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并可附带地解决现有的半失业的二十万城市贫民的问题。

（六）西南劳改犯数万人，过去因为谋求生产自给，到处乱挤，发展了生产的盲目性，相当地影响了公私经济。今后必须把还未安置的这部分人的问题列入各地财委计划之内，停止

盲目性。把这些人安置到比较长远的生产事业中去，而且应以农业、林业为主，才不致向城市乱挤。会议规定每个省、区订出今年内安置劳改犯人的计划，迅速报来批准施行。

我们认为采取上述各项措施，召开一系列的资本家会议、工人会议和四员（采购员、验收员、税收员、放款员）会议加以贯彻，则力争在七月份内完全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是可能的。

二、关于“三反”后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生活制度建设，以及结束“三反”的定案追赃工作，我们系根据中央六月十五日《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6〕}精神进行讨论。我们完全同意中央这个指示，并遵照执行。西南“三反”定案工作，一般是严肃的，现已定案的“老虎”^{〔7〕}力争七月份内处理完毕。思想建设正在进行，在交代关系中，完全遵照中央指示，启发自觉，不追不逼，排列名单，严格控制，这种做法效果很好，既有教育作用，又发现不少新的材料。详情以后再作专题报告。在“三反”中暴露出的一些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主要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故在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又主要是与领导干部的消极情绪和放松领导责任有关。其典型例子是在今年五一节公安部某处派勤务时，有些干部不听分配，结果采取抓阉办法解决。这虽是个别情况，但问题是严重的，所以在建设阶段还须注意纪律性的教育，适当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想。鉴于在一般工作人员中，有的因为曾对领导提过意见，存有怕领导报复的情绪，故在方式上应着重从积极方面教育诱导，禁止来一个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或阶段。因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改造是一个长

期的教育过程，不允许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

三、关于工业交通的五年建设计划，我们完全同意分配给西南区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繁重，为了保障其实现，西南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必须立即真正地把工作重心转向工业、转向城市。同时，会议决定坚决抽调二十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十个县委书记转作经济工作，主要分配到基本建设和现有厂矿中工作。

四、关于下半年的工作排列，会议作了如下的规定：

（一）在“三反”的基础上，争取于七八两月完成整党与清理中层^{〔8〕}的工作，这是办得到的。党员八条标准^{〔9〕}的教育，有的做了，有的还没有做。没有做者，可在结束整党之后划出一个时间去补课，以免把整党时间拖得太久，妨碍了建党工作。

（二）建党是西南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必须按照中央指示，在明年六月以前完成发展几十万党员的任务，这次会议并作了具体的分配。

（三）对于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我们规定凡属进行了“三反”的国营企业和进行了“五反”的私营企业，就应宣布民主改革运动的结束，这样的好处是使我们的工作同志能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到生产上面。

（四）学校改革照原订计划进行，已进行的十二个大专学校要在暑假前结束，其余十校留在下学期开学后进行。中等学校一律采用川北办法，在今年暑假期间用集训教师的方法解决。对小学教师则采用川南办法，用召集代表会议的方法解决。为此，学校改革的任务，今年内是可以大体完成的。

（五）禁毒运动确定暂时不动，但规定各地必须于七月底作做好准备，订好计划由西南局审查，然后再看情况规定发动时

间和具体政策。在方法上，力求十天左右解决问题，以免波动太长，影响工商业。

（六）乡村建政和干部集训，一律推到秋收后进行，以免影响农业生产。查田评产工作，已有三分之一地区，即进行了土改^{〔10〕}复查的地区做了，尚未做的地区，也留在秋后进行。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三反” 指 1951 年底至 1952 年 10 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2〕刘岱峰 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 年 10 月 21 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4〕“五反” 指 1952 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5〕五毒 指五反运动中所反对的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

〔6〕《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 195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完满结束三反运动，第一，必须作好正确定案和适当处理的工作，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宽者宽之，应当严者严之”；第二，切实做好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

〔7〕“老虎” 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

〔8〕当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中层 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企事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9〕党员八条标准 见本书第 406 页注〔19〕。

〔10〕土改 见本书第 10 页注〔3〕。

三反五反运动的总结^{*}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我讲的是如何在“三反”^[1]和“五反”^[2]胜利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三反五反运动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先后展开，现在已五个多月了。“三反”、“五反”是同时进行而又互相配合的。参加“三反”的党、政、企业系统的工作人员约四十五万人，进行“五反”的城市和重要集镇约三百个。无论“三反”或“五反”，都开展得广泛、深入。“三反”和“五反”现在已到基本结束或接近基本结束的时候，因此，需要把“三反”和“五反”的情况初步总结一下，提出任务，以便在此胜利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

—

对“三反”、“五反”概括的估计。

在三反运动中清查出了一批贪污分子，打出了一批“老虎”^[3]，同时还打出了一批经济坐探、“双皮老虎”（即反革命分子），暴露出了严重的浪费现象，揭露出了许多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现象。这些事实说明了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从

^{*} 这是邓小平在西南党政军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领导到群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经过“三反”，纠正了许多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训，改善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同时，经过“三反”，浪费大大减少，挽救了一批小贪污分子，包括一部分大、中贪污分子，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进而交代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社会关系，党及政府对干部的面貌看得更清楚了。在运动中还提拔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工作效率提高了，到处出现了新的气象。

“五反”的主要收获，是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干部、党员认识了资产阶级，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经过“五反”，消除了资本家的“五毒”^{〔4〕}行为，查出了一批“派进来”、“拉出去”的经济坐探，发动和教育了工人阶级，整理了工会组织。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同时也巩固了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无论“三反”或“五反”，更大的收获是划清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

获得所有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毛主席号召英明，党中央政策非常明确，领导得具体，控制得严格；其次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否则，就不可能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也不可能发现这么多的贪污分子；第三是及时传播了经验和纠正了偏向，纠正了某些问题的错误观点。正由于采取了这样严肃的态度，运动才走上健康的道路。例如“五反”中有计算过高，“三反”中有逼、供、信的偏向，均及时纠正了。大多数领导干部对运动的意义认识清楚，依靠了群众，运动才获得成功。

“三反”、“五反”的收获是很大的，运动是健康的，但不等于经过“三反”、“五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譬如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有些同志还不清楚；在运动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如纪律松弛等；官僚主义也不是完全克服了，小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都有在思想上弄清楚之必要。如此，才能在“三反”、“五反”胜利的基础上，各方面提高一步。

在结束“三反”时主要是两件工作：

（一）定案追赃要求实事求是，反对虎头蛇尾，放虎归山，同时，也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定案。是则是，非则非，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

（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改进在“三反”中所发现的工作缺点，以便在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

二

划清资产阶级的界限及对资产阶级的认识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一方面大家深刻认识了资产阶级丑恶的一面，认识了资产阶级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享乐至上的阶级本质。对于这一点，“五反”前很多同志体会不够，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5]上的警告也体会不够；但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6]。从这方面说，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之一。此后，他们举手通过了《共同纲领》^[7]，在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中，他们还是一股力量，一脚踢开他们的“左”的思想是错误的。这就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十条中说：“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七条说：“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条文是根据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用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制定的，“五反”又是根据《共同纲领》的原则来进行的，其目的是使《共同纲领》得以贯彻和保障。经过“五反”，暴露出一些糊涂的观点，需要加以澄清。

有人以为“五反”之后，资产阶级就会老实了，不至于再犯“五毒”了，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不是从资产阶级的本质上去看问题。“五反”教育了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但有一部分是会旧性不改的。“五反”后发现资本家在茶铺中做生意，互相成交，不上账，不纳税，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本质。如果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好，“五毒”是会减少一些，但不等于没有。所以必须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作用，使资产阶级不致再施“五毒”。

有人以为资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无须加以重视了，这是一种“左”倾的错误观点。他们忽视了资产阶级在发展国民经济事业中曾经起到的和将继续起到的作用。

有人以为从此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没有必要了，无须对资产阶级进行工作了，这同样是一种“左”倾的错误观点。资产阶级向国家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其“五毒”罪行发展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如任其发展，是有来自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的危险的。我们的“五反”不但巩固了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而且把资产阶级从悬崖绝壁的境地挽救过来，从而巩固了统一战线，这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应做更

多的工作，既要反对其重犯“五毒”的消极一面，又要鼓励资方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的积极一面。

在公私关系方面，应一本历来的政策，随时注意调整公私关系。过去的毛病在于对资产阶级的“五毒”罪行缺乏警惕性，在资产阶级和我们内部资产阶级分子与经济坐探的夹攻下，国家和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今后在这方面引起警觉是完全必要的。但要防止走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忽视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鼓励和扶助。例如加工订货的合理利润计算过低，在验收成品时规格订得太严，银行不积极贷款，规定太苛，公私营业分配不恰当等都是不好的。“五反”对资本家不能过严，也不能过宽，核实定案必须恰当，表现好的可以降级核减，退赃时间可以放宽，但税收是国家法令制度，一点不能放松。

在劳资关系方面，主要是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同时纠正一些“左”的现象，如老板吃一餐饭不准开支，资本家的儿子读书不准开支，要资本家参加劳动而自己休息等。这些都不能怪工人，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未做好。由“三反”和“五反”所引起的暂时的不正常的状态需要合理解决。工人监督生产，除了已进行的几十个企业外，暂不扩大试行范围，俟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但监督和防止资本家再施“五毒”，必须主要采取订立劳资合同及爱国公约的方法。成都的经验很好，规定五人以上的工厂、商店一律订劳资合同，四人以下的厂店订爱国公约，各地可以仿行。其他如城乡、内外、经济改组等一本《共同纲领》办事。

“三反”、“五反”后，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气象，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计划经济的建设。我们除了加强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还必须充分发挥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之

互相配合起来，以便早日出现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三

内部清算资产阶级思想问题。

西南各地三反运动已进入建设阶段，正进行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和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工作，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了“三反”的成果。经过了这一步骤，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觉悟和水平均大大提高了，对人事问题清楚了，因而也就达到了纯洁内部的目的，同时也解决了整党的主要问题。但是，不等于“三反”、“五反”，就完全肃清了国家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仍不断地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机关工作人员中不但有被资产阶级“派进来”、“拉出去”的资产阶级分子，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或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或受欧美资本主义教育中毒较深，其思想更为接近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所说，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8〕}。“三反”中揭发了大批的贪污分子、蜕化分子和严重的浪费行为，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严重性，不少人在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之下倒下去了，有的甚至变成了经济坐探。同时，初步清算了在技术人员和教学人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他们不少人崇拜欧美，否认或怀疑苏联先进技术，对群众的智慧和合理化建议采取冷淡或拒绝的态度（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不幸也是如此），在教学中脱离实际，散布毒素，宣传英美，各方面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度。同样也暴露出国家经济工作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工矿企业中的保守思想，贸易合作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对农业的合作道路采取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态度。因此，要联系自己的业务来清算资产阶级思想，才会起到教育的意义。

我们有些同志要求资产阶级也抛弃其阶级思想，企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他们，当然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但对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则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教育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尤其在经济工作中纠正资产阶级思想。

“三反”、“五反”暴露了资产阶级丑恶一面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人不敢负责任了，有的不愿做经济工作，怕和资本家接触了，机关的总务采购都不愿干了，怕上当，怕犯贪污错误。有人说不是“今后从严”吗？这除了少数一些人是持抗拒态度外，主要表现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为什么你對自己今后是否会贪污这一点都没有把握了呢？难道除了经济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就没有贪污的机会吗？问题是“真金不怕火烧”，主要看自己的脚是否站得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责任、逃避斗争、逃避现实的右倾思想，也是一种放弃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你想，在什么岗位上能逃避接触资产阶级的现实呢？更不用谈思想的影响了。我们对资产阶级有团结有斗争，所以清算资产阶级思想是必要的，而且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四

反对官僚主义后，领导上确有改进，这是带有普遍性的情况。但一部分领导者表示不敢领导，实际上是放弃领导。在运

动中群众对领导提了很多意见，一些领导同志就怕犯错误，个别品质极坏的还采取报复行为。有一个老干部反映，他提了科长的意见，整编中被清洗了。从这点说，官僚主义仍在横行。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在“三反”后，积极性提高了，但有个别的部门个别的人出现了不遵守纪律，不尊重领导的现象。如某单位在“五一”派勤务大家不愿去，结果采取抓阄的办法，这是极坏的现象。“三反”后，一般工作人员不愿负责不敢负责的工作态度也很严重。比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按酬给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工作态度；怕犯错误，做起事来束手束脚，银行有人在数钞票时手脚会抖，满面汗流不敢拿出手帕来揩，怕被人怀疑装腰包。此外，也还出现了一些强调个人兴趣的个人主义，“一心想做专家”，认为“做小事太委屈了”，也暴露了一些平均主义思想。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在“三反”中未受到应有的批判。

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列宁说：小有产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阶级，在欧洲许多国家里，有极广大的群众代表），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且异常急速地陷于贫困和破产，所以容易转到极端的革命狂热，但不能表现坚忍性、有组织、有纪律和坚定精神。这种革命狂热之动摇不定，华而不实，以及迅速转为驯服、消沉和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某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种本性是人所共知的^[9]。毛主席也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10]。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民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

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此外，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应该好好学习。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到实际中来，不是“左”就是右，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才不致犯错误。有些人只愿承认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不愿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认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点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算不了什么。所以，批判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克服各种消极作用，加强政治责任心和纪律性，以巩固“三反”、“五反”的成果，使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一步。但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克服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绝不允许来一个清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什么阶段。

五

“三反”后的建设工作。

“三反”、“五反”接近基本结束，七月可完全结束。我们要在“三反”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建设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巩固运动的成果。建设工作中中央有专门指示，要消除资产阶级思想，耐心地批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不必搞成一个运动。方法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从九、十月份起实行正规的学年制，以加强思想建设工作。组织上、制度上的建设，中央也有指示。组织建设的中心内容是整编。整编的目的

在于确定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制度建设的内容包括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工作、生活、学习等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首先健全机关党内的民主生活，而党员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则是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应定期召开，认真进行；其次则为机关内的民主生活制度的建立，而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会议和小组会议，以及每年一次的民主检讨制度，均应按期进行。

以上就是“三反”结束阶段的工作任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邓小平手
稿刊印

注 释

〔1〕“三反”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2〕“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3〕“老虎” 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

〔4〕“五毒” 指五反运动中所反对的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

〔5〕七届二中全会 见本书第29页注〔1〕。

〔6〕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7〕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8〕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9〕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143页）。新的译文是：“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10〕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为《重庆日报》创刊题词

(一九五二年八月五日)

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
祝贺重庆日报创刊

邓小平

根据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1952年8月5日发表的手迹刊印

加紧搞好西南工作 迎接全国计划经济建设^{*}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

西南工作我在去年十月报告过一次。今天只报告这半年多的工作情况。

关于西南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1]第三次会议确定：在抗美援朝^[2]、土地改革^[3]、镇压反革命^[4]三大运动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此外，再加上几个主要的工作：第一，积极开展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号召的爱国增产运动。第二，为了迎接今后的计划经济建设，今年必须完成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第三，今年必须完成学校的民主改革运动。所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规定的任务是繁重的。

从今年元旦毛主席号召开展三反运动以来，西南工作就紧张起来了。“三反”^[5]以后紧接着“五反”^[6]，三反五反运动整整进行了半年，当时我们很担心今年的几大运动能否完成。但后来事实证明，三反五反运动不但完成了，而且推动了其他重要工作的进行。

^{*} 这是邓小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关于西南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2年8月7日，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一、“三反”、“五反”的主要情况。

“三反”。参加三反运动的党政机关一共有四、五万人，县以上及少数区级干部都参加了这个运动，只剩下少数学校还没有进行，但比重很小。从人数上来看运动是广泛的，同时对于老干部的教育也是极大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里面也有官僚主义）在“三反”中也反出来了。所有参加运动的人，包括中共中央西南局、省委、政府系统，凡是过了关的都飞跃地前进了，人变了、社会变了、风气也变了。事实证明，不进行三反运动不行。但是，早进行条件不成熟，而再迟一点更不行。所以，这个时期正好条件成熟了。虽然三反运动也发生逼、供、信等情况，但后来都纠正了。

“五反”。西南一共有三百个城市及重要集镇进行了“五反”。原来我们采取典型试验的办法，但是，后来发现许多城市工商业都等着搞“五反”，因此我们考虑快一点进行好，所以分成一、二、三等城市同时进行。过去，全国对西南的舆论不大好，讲土地改革过火了、工厂是共产主义。但五反运动结果证明：西南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因素还有发展，资本家还能赚钱。运动中，我们本着毛主席规定的处理从宽的政策进行退补。三百个大、中、小城市的违法所得一共是三万亿^[7]以上，实际退补的只有几千亿。

三反五反运动推动了工矿企业、工商业界及学校民主改革运动的进行，克服了“三害”、“五毒”^[8]危险，巩固了统一战线。总起来说，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得广泛深入，现在基本上结束了。

三反五反运动加速了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我们今年计划工矿企业民主改革的职工数目是八十万人，里面包括百人以上

的厂矿工人二十四万、店员十二万。“五反”中完成了十二万店员、工人的民主改革，还剩下十来万零星分散的建筑、搬运、码头工人，这部分难度大一点。

如果没有“三反”，学校民主改革恐怕也难搞，就是搞也不会搞得这样好。西南二十二个大专学校中，已经有十二个完成了思想改造。方法基本是运用北京的经验，搞得还不错，其余的大专学校要在开学以后再搞。因为大专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靠学生，当然也有进步的教授、职员。在小学里面，我们利用了过去川北经验，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召开几百人的代表会，分批的搞半个月就差不多了。因为小学里面的民主改革不是学生的事而是教职员的事，所以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

“三反”、“五反”推动了各方面工作，也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比如重庆及各大城市爱国卫生运动的规模相当大，现在重庆到处都在打苍蝇，自己家里没有了就跑到街上去打。过去四川老鼠多，卫生运动一开展，到处都捉老鼠，一交就是几万只。

二、土地改革的情况。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们很担心土地改革要推迟，但结果证明不但没有推迟，反而比去年搞得还好。因为人员调剂得非常适当，“三反”没有牵连到搞土地改革的人。西南土改，从前年冬季开始到去年六月为止进行了两期，完成了三千六百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从去年冬季开始进行第三期，三期共完成四千五百多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四川是四月份完成的，云南、贵州是五月份完成的。还剩下一千六百万农业人口地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其中六百万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说西南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

总的说，第三期土地改革比第二期做得好一点，时间长一

点，包括复查。有些地区经过反霸、清匪^{〔9〕}、减租^{〔10〕}以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同时，地主阶级的准备也非常充分，对付农民的办法很多。因此，土地改革是从头做起的，做得很深入很仔细，并没有因为“三反”而工作粗糙。

三、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情况。

“三反”、“五反”以后，包括私营的工矿企业生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官僚主义少了，工人的意见、合理化建议也被重视了。比如重庆纱厂的产量大大提高以后，因为棉花供应不及时就停工了，后来由中财委^{〔11〕}帮助把棉花问题解决了才又开了工。西南计划一九五二年包括公私企业的工矿企业，要增产节约约三万亿人民币，现在估计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四、农业方面情况。

目前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最后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今年云、贵、川、康大体上是丰收，当然这个丰收也很不容易，春耕的时候旱得很厉害，上千万人抢种、抢水，上千万人治虫，由于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所以，现在看农业增产是有把握的。但是，就怕下半年有暴风雨，据气象台说今年八月份有暴风雨。只要这一关过得好，丰收是有希望的。

工商业在“三反”、“五反”以后，特别是三四五三个月间，生产经营有点停顿，情况不太好。六月开始恢复，到了七月全部恢复到去年十二月的水平了。若干地方如成都、重庆还超过去年十二月百分之九，现在是更正常、更健康了。同时，由于举行物资交流大会，大中城市普遍开始交易。重庆物资交流大会^{〔12〕}交易额在一万三千亿以上，一般县城物资交流大会的交易额也有百把亿，估计西南全部交易额约有两三万亿。

现在土产供不应求。比如，重庆锦缎过去没有销路，大城市的人都不喜欢穿，但是今年西北去订货，估计再生产一年也不够他们订的。现在来看，“三反”、“五反”对经济方面影响不大，以后更能促进发展，特别是工商业交易会大大提高，增产节约更有保证，迎接今后计划经济建设的基础也会打得更稳固。

五、税收方面的情况。

按照西南通过的全年税收预算，预计上半年完成百分之三十七，现在已完成百分之四十，下半年全部完成是没有问题的。

六、关于民族工作情况。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几次会议规定的具体方针政策，实行的结果，现在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正常、稳定。在内地大问题解决了，大乱子没有了，而小乱子、小问题恐怕将来也还可能发生。为什么民族关系能这样正常呢？其主要是因为真正实行了共同纲领^[13]，实行了区域自治。现在我们正在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并且在贸易、卫生方面诚心诚意地扶植帮助他们，特别是在贸易方面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少数民族不断地到重庆、成都来，相互了解，因此关系正常了。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贵州已全部实行了土地改革，那里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苗族和彝族，他们很拥护土改，没出什么问题。民族关系复杂的云南内地，九十多个县也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事实证明，在贵州、云南这些地区如果不搞土地改革，少数民族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土地主要还在汉族人手里，不实行土地改革，少数民族就分不到土地。所以，实际上少数民族很拥护土地改革。云南有二十多个县划成缓冲

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问我们，这些县到底搞不搞土地改革？我们意见还是搞。土地改革是一场阶级斗争，风声很大，来势凶猛，如果内地一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也会知道土地改革的来势很凶猛。所以，我们把云南二十多个县划为缓冲地带，并且把缓冲地带的土地改革搞得很温和。搞温和一点好，因为这可以给边疆的少数民族看一看，使他们感到将来搞土地改革也不过这样，以安定他们的情绪。现在云南正在做，结果证明问题解决了。

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特别是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很受感动。有的人从来不知道中国天下有多大，到了上海一走，唉呀！中国这么大。请他们坐了兵舰以后他们更感到惊讶，从来不相信中国有兵舰、有飞机，只觉得帝国主义才有，现在看到中国也有了，于是他们觉得中国是强大了，帝国主义不可怕。所以，以前跑出去的人，现在又陆续跑回来了。只要你与帝国主义脱离关系，与蒋介石脱离关系，我们则既往不咎。

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搞了区域自治，搞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4]，关系已经稳定起来，团结起来了。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心问题就是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买到盐、买到布，使他们吃得上、穿得上，也就是使他们从经济上得到利益。要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利益，没有交通，那只是空谈。我们过去提倡“货郎担”，现在货郎担子搞小的行，搞大的还不行，要大量的搞就需要公路，用汽车运输，没有这个基础，“货郎担”也可能没有货，挑空担子。现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发展交通，只有发展交通，才能使那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达起来，不然，将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那些地方还那样落后怎么能行呢？所以，关键是要修公路。从云南内地到西康^[15]少数民族地区有一条公路，这条公路起的作用很大。这次成渝铁

路^[16]通车以后，大家非常高兴，老百姓都穿上花衣服、新衣服，像过节一样，差不多每天有五六万人去看铁路。

附带谈一下西藏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亲自主持解决的，民族政策很稳当，做得很好。班禅^[17]回去以后基本上团结起来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同志在那里搞得也很好。但是，前一个时期曾经发生乱子，有的人组织一些受帝国主义影响的人，组织所谓的人民代表会，搞骚乱。我们作了一些准备，处理了为首的组织者，对一般人作了宽大处理，当然也进行了必要斗争，结果没出什么乱子，达到了进一步的团结。

关于西南一般情况还要说几句。西南从解放到现在已经两年零七个月了，其中经历了几个过程。首先，刚解放时我们面前的形势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改造九十万国民党投降起义军队，肃清九十万土匪及教育被国民党、土匪反动宣传所蒙蔽的六千万农民群众等问题须要解决。所以，从一九五〇年二月到七月，西南工作就是解决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的问题，这一阶段用了半年时间。接着，于七月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方针、任务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18]。到去年六月底，执行这八个字的结果，封建势力的气焰基本上被打下去了，农民生产发展了，生活大大改善了。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规定的任务是搞土地改革，这是我们第三个阶段的工作，一直搞到现在，大概到今冬就可以结束了。

去年是三大运动，今年是搞“三反”、“五反”及爱国增产运动、工矿民主改革运动、学校教育改革运动、思想改造运动。这一系列运动，都是广泛的群众运动。从运动结果看，群众发动起来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川北现在人人都是可以穿上

新衣服了。经过这一段工作，各阶级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的人、封建思想很浓厚的人在内，觉悟都大大提高了。总的来说，就是大家看到我们国家一天比一天好，气象一天比一天新，经济一天比一天繁荣，都高兴得很。

西南比其他地区晚解放一两年，友邻地区的工作都走到我们前边了，就是比起其他先解放的老区也要差一点。因此，我们不加紧搞就很难迎接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到来。但是，我们今天同样有把握来迎接全国计划经济的建设。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刊印

注 释

〔1〕西南军政委员会 1950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任副主席。

〔2〕抗美援朝 见本书第307页注〔5〕。

〔3〕土地改革 见本书第10页注〔3〕。

〔4〕镇压反革命 见本书第298页注〔11〕。

〔5〕“三反” 指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6〕“五反” 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7〕三万亿 为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

〔8〕“三害” 指三反运动中所反对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种违法行为。“五毒” 指五反运动中所反对的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9〕反霸、清匪 见本书第30页注〔3〕。

〔10〕减租 见本书第56页注〔8〕。

〔11〕中财委 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10月21日成立。陈云任主任。

〔12〕重庆物资交流大会 指1951年7月21日在重庆举行的西南物资交流大会。

〔13〕共同纲领 见本书第34页注〔2〕。

〔14〕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见本书第205页注〔12〕。

〔15〕西康 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6〕成渝铁路 指成都至重庆的铁路。1950年6月15日开始动工，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

〔17〕班禅 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18〕退押 见本书第192页注〔5〕。

